

- Fox, J. J. 2006. Austronesian societies and their transformations. In Fox, J., Bellwood, P., & Tryon, D. (Eds.), *The Austronesians: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pp. 229-244). Canberra: ANU Press.
- 2008. Installing the "outsider" inside: The exploration of an epistemic Austronesian cultural theme and its social significance. *Indonesia and Malay World*, 36 (105), 201-218.
- Geertz, C. 1983. From the native's point of view: On the nature of anthropological knowledge. In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pp. 55-70). New York: Basic Books.
- Linnekin, J., & Poyer, L. (eds.). 1990. *Cultural identity and ethnicity in the Pacific*.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Rudolph, M. 2008. *Ritual performances as authenticating practices: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of Taiwan's aborigines in times of political change*. Münster: LIT Verlag.
- Sahlins, M. 2008. The stranger-king or,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politics of life. *Indonesia and the Malay World*, 36 (105), 177-199.
- Tsai, F. C. L. 2010. *Paying modernity: Play as a path shuttling across space and time of A'tolan Amis in Taiwan*. Ph.D. Dissertation. Hsinchu: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陳映真的第三世界*

瓦解「本／外省人」、「台灣／中國人」、「美國人」、
「歐洲人」……〔下〕**

陳光興

Chen Yingzhen's Third World
Decolonizing "Taiwanese," "Chinese," "American,"
"European"... [Part II]
by Kuan-Hsing CHEN

關鍵詞：陳映真、第三世界、分斷體制、外省人、本省人、失鄉人

Keywords: Chen Yingzhen, Third World, division system, mainlander, homelandless

* 本文送給2011年春上海陳映真研讀班的同學們。寫作過程中收到許多朋友們的回饋，特別是張立本非常細心地閱讀了文稿，提出相當多的討論與修改意見。

** 編按：此文長，分上下兩次刊出，上篇見本刊107期。

摘要

1949年起中國大陸與台灣之間所逐漸形成堅固的對峙機制，或許可以用韓國思想家白樂晴的分析概念「分斷體制」來描繪，五十年後，雖然這個體制在弱化當中，但早已深入社會身體的主體性構造。自1960年起的四十多年來，分斷及其克服初步成為陳映真思想與文學核心關切的主題，甚至是具有籠罩性的前提命題。分斷體制牽扯龐雜，本文嘗試將分析聚焦於一個切面：外省失鄉人，指稱的是1949年以後從大陸遠離家鄉流亡台灣的人，他們存在的特性在於，他們不同於一般在國內暫住他鄉的外地人，也不是移居國外的移民，而是因為國家內部的政治分化造成的強制性遷移，有家歸不得。相對而言，「外省人」沒法孤立存在，他的對應關係是「本省人」，在陳映真筆下是在家鄉歷經滄桑的「淪落人」。理解外省人與本省人的精神處境與困境，可以說是陳映真在台灣內部克服民族分斷的實踐。本文透過細讀陳早期的小說〈貓牠們的祖母〉(1961)、〈將軍族〉(1964)、〈一綠色之候鳥〉(1964)、〈第一件差事〉(1967)、〈永恆的大地〉(1966)、〈纍纍〉(1967)、中期的〈夜行貨車〉(1978)、〈雲〉(1980)、與近期的〈歸鄉〉(1999)與〈忠孝公園〉(2001)，重新勾勒外省人在半世紀的歷史進程中生命與政治道路的起伏。本文試圖在思想上深化對於第三世界精神狀況的理解。

Abstract

From 1949 onward, a solid set of antagonistic mechanisms was gradually established between Taiwan and Mainland China, which can be conceptualized, in Korean thinker Paik Nak-chung's terms, as the formation of a "division system." Fifty years later, the system is weakening and in crisis, but the long term effects remain deeply seated in social body and the structure of subjectivity. Since the 1960s, division system (and its overcoming) has been at the

center of Chen Yingzhen's thought and literature to the extent that it has become a presupposition encompassing all his work. Due to the complexity of the division system, this essay focuses on only one plane of the problematic subject: *waishengren* or mainlander who lost their home. *Waishengren* refers to those who moved from their mainland homeland to be "in exile" in Taiwan. Different from the situation of "diaspora," they are neither immigrants dwelling in a foreign territory, nor temporarily residing in other parts of one's own country, but are forced to move by the political conflicts within a nation, and hence cannot return to their home. In relational term, *waishengren* co-exists with *benshengren*, i.e. people "native" to the Taiwan island. To understand the difficult mental conditions of both *waishengren* and *benshengren* has been Chen Yingzhen's practice to overcome the division of the nation within Taiwan. This essay reads closely Chen's stories written over the time span of forty years, starting from the earliest "Cats and Their Grandma" (1961), via "The Cloud" (1980) of the middle period, to the latest "Loyal-Filial Park" (2001). With an attempt to give an account of the lives and political paths of *waishengren*, the essay contributes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mental conditions of life in the Third World.

「我說這頭的燈早壞了，不亮。那頭的，一到入夜，就照得通亮通亮」

1981年，署名亞菁的評論者指出，〈第一件差事〉「奠定陳映真在文學史的地位」，並且說該文得到廣大讀者的好評，足見這篇小說該得到文學界的重視。但是從1967年出版後，十四年間居然沒有任何的專論，可能的原因是：「站在藝術的立場，其人誠然誤墮歧途，但他的作品卻沒有政治意味，且又曾受政府的寬恕」(亞菁 1981: 151)，所以評論家試圖補上這塊空白，做出深度評論。從亞菁的文字中，我們可以嗅到，陳映真1968年的入獄似乎使評論界怯步，不太願意惹麻煩，直到他得到政府的「寬恕」後，情況才改觀。無論如何，從今天來回看，〈第一件差事〉在六、七〇年代當時可能是被文學界高度評價的作品，但因政治原而被暫時掩埋了。

放在陳映真書寫外省人的軌跡來看，〈第一件差事〉是他進一步嘗試理解外省人精神困境的文字。主人公胡心保是一個濃眉大眼個子高大的北方帥哥，有個幸福美滿的家，太太漂亮，女兒可愛，又有份好工作，才三十四歲就在洋行當經理，忽然就尋了短見，不合常理，到底是怎麼回事？故事發生在一個小鎮上，敘事者是警校才畢業一年多的杜警官，碰上了在佳賓旅社自殺生亡的胡心保。這是他第一次調查命案的差事，緊張又興奮，開始訪查死者生前三天在鎮上談過話的三個人：旅社老闆劉瑞昌、小學體育老師儲亦龍、以及死者的情婦林碧珍，試圖從偵查的供詞裡拼貼出胡心保的死因。

在這個擔心因為出了命案影響旅店生意的劉老闆的記憶中，胡心保是十六日當天下午四點多來的，他對旅社的房間都不滿意，可能是那時代小地方的設備普遍差罷，連房間的木板牆上都被人挖了能偷窺的小洞。為了增加收入，旅店都僱了些小姐，到了夜間，不是老闆來敲門就是撥電話到房間問你要不要。這樣的小旅社一直到九〇年代初

期都還有，作家不過是記錄了這個歷史悠久的行當。雖然不滿意，小胡沒有選擇走人，最後要了窗外可以看到他認為好看的水泥橋的那間。選了房，老闆跟他要身分證做登記用，問客人是來出差的，他說是出來散心，看來是心情不好才一人跑來這小鎮解解悶。

兩人這樣開始聊上了。老闆說小地方生意不好，過一天算一天，小胡接話說，「一天過一天，我都過得心慌了」；怎麼會呢？老闆說，年輕有為又賺不少錢，沒事還到處旅遊，小胡苦笑中嘆了口氣說，「哎，年輕有為，可是忽然找不到路走了」(陳映真 2001j: 171)。這小胡顯然不同於一般人，好好地跟家人一起過日子就算了，但是他過得發慌，像是生命失去了方向，不知道該往哪兒走下去。小胡進一步說了內心的狀況：「昨天我還在拼命趕路，今天你卻一下子看不見前面的東西，彷彿誰用橡皮什麼的把一切都給抹掉了」(2001j: 173)。趕路的人都知道前進的目標，但是一覺醒來目標不見了，原來畫好的方向被橡皮擦擦掉了，前面的路也白趕了，不知何去何從。怎麼回事呢？小胡面對著陌生不相干的旅店老闆，說出了自己的困境。像他這樣的人為了求生存，只能馬不停蹄向前行，飄洋過海來到台灣，沒有什麼空間停下來想。現在什麼都有了，才有機會停下來喘口氣、想想，才發現失去了方向感，甚至開始質疑起當初到底為什麼要趕路？是為了什麼？難道只是因為回不去大陸的家鄉嗎？

小胡喜歡房間窗前這橋，是因為很像記憶中的那一座，都弓著像隻貓那樣，差別在於這裡橋兩邊的橋頭都裝了燈，只是這邊的壞了，那邊的是好的，到了晚上燈火通明，而記憶中的那橋兩邊都沒燈。在文脈中推演，兩個橋顯然是重要的媒介，對小胡來說，橋對岸那些過去的事都鮮活地存在，反而是此岸一片漆黑，什麼都看不到。那座記憶猶新的橋，是他十八歲那年跟著一夥人沒日沒夜逃難的路上碰上的。在沒有月亮但是滿天星光的夜晚，趕了橫跨三個省的路，他們在個偏僻的地方停下來過夜，跟著他一起的十四歲男孩被他拉著到橋下

睡。太累了吧，身旁的這男孩「兩腳一軟，就癱在地上；我拉拉他，才知道他死了……當天大家全睡了，只有我一個人終夜沒睡，我一直看那座橋的影子，它只是靜靜地弓著」(2001j: 175)。旁邊躺著這個斷了氣、一起跑了不少路的小朋友，你要他怎麼睡？估計小胡也沒跟人說，第二天就讓他繼續在那兒躺著了，沒法忘掉的是那座看了一整夜的橋，弓起來像隻準備戰鬥的貓那樣。所以，窗前的橋就把他帶回十八歲逃難的場景，人死了都跟家常便飯一樣。

第二天，小胡起了個大早，先去看了水道邊的那座橋，然後沒目的地逛到了鎮上的小學，在籃球場上跟體育老師儲亦龍不期而遇。兩人鬥牛，邊打邊聊，打完還去福利社吃冰，繼續聊了半天，才回旅店房間洗澡。

這四十二歲的老儲生命經驗複雜。才二十歲在青島就當上了鄉長，騎著白馬，前後都跟了一隊兵，好不威風。後來去上海念書，才開始跟體育結緣，先踢足球，後來跳探戈得了第一名。內戰時，老儲成了國民黨的特務，狠狠地殺了六七百共產黨人，功在黨國。撤退時，他丟下了青島、上海的兩個老婆，帶著才兩三歲的寶貝兒子來台灣，把一切都寄託在這乖巧的命根子身上，沒想到兩年前給車撞死了。兒子死了，老儲不再有啥指望，該吃的吃，該睡的睡，打打球解悶，只求平安過日子。

大概是有重疊的戰亂經驗，跟劉老闆不同，小胡跟老儲聊得特別多。久不打球的小胡，一下場就看得出他是老手，打得好不說，姿勢也漂亮。他說當初逃難到了廣州，沒錢，除了吃香蕉就是打籃球，從早到晚猛打球，身體才鍛鍊得比較好。後來到了台灣，同學病的病、死的死，所以是打球「把這條命給打出了死亡……想起這些過去的事，真開心」(2001j: 186)。過去苦，經歷也慘，但是回想起來比起現在的安穩卻讓人流連。知道老儲剛死了兒子，又聽他說一直到下葬都沒掉一滴眼淚，小胡半安慰半感慨地說：「活著也未必比死了好過；死了也

未必比活著幸福」(2001j: 184)。老儲聽了很受用，認為小胡的話說到他心裡去了，就是因為這理由，所以才沒掉淚。是啊，活在這個年代裡，看不到未來在哪兒，死了就不必發愁。然而不明不白就這樣死了，沒法歸根，糊塗死也沒什麼幸福好說。關鍵是，對一般人像杜警官來說，這些都是「過去了的事」，「少去想它罷」，別自尋煩惱。然而，這正是生命矛盾之所在，過去的想法多了沒用，沒錯，但是對小胡來說，很多開心的事，又綁樁似地跟過去分不開；「想起過去的事，真叫人開心」(2001j: 185)，他重複的說了好幾次。縱使是痛苦的經驗，今天想想也都讓人心悸，就像是戰亂時走過的點點滴滴，是讓人痛苦，但是又讓人難以忘懷，例如在橋底下死在他身旁的男孩，跟他一起睡了一晚。

小胡跟老儲說了一段自己的故事。家裡開的是大錢莊，但是三代只傳下他一個男的，寶貝到不行，一直到十幾歲「還被抱在膝上餵飯吃」(2001j: 185)。後來開始要逃難了，學校整個南移，小胡他爹不放心，就在他腰上綁了金條，但是為了趕路，太重了沒法走，沿路丟，最後還是沒辦法，一天晚上，他就把金子全扔到河裡去了。小胡的意思是說，家家風水輪流轉，富不過三代，他老爸享受了，輪不到他的，家財萬貫最後還是丟到水裡去了。到台灣才十九歲，家人好容易把他送出來，留個未來吧，也就「歷經浩劫而不死」地活過來了，只能拼了命奮發向上。但是，「我於今也小有地位，也結了婚，也養了個女兒。然後又怎麼樣呢？」(2001j: 187)，小胡說，「忽然不曉得怎麼過來的，又將怎麼過下去」，就像是「你在航海，已非一日。但是忽然間羅盤停了，航路地圖模糊了，電訊斷絕了，海風也不吹了」。這是小胡第二次跟陌生人說路走不下去。該跟出生有錢人家有關，特別會對好的物質生活意味著什麼有充分的理解，所以不會像窮人家的孩子那樣，吃苦上進是為了過好日子。他的動力該是回報家人花了很大力氣把他送出來，問題是那個家回不去了，通往對岸的橋上架了路障，過

不去，而且遙遙無期。他才會說電訊不通了，海上也沒風了，有航海圖也沒用，船沒法啟航。有家歸不得！

至為關鍵的是胡心保完全被過去的人、過去的事網住：「儘管妻兒的笑語盈耳，我的心卻肅靜得很，只聽見過去的人和事物，在那邊兒嘩嘩地流著」(2001j: 189)。這是理解他路走不下去最為重要的線索：眼前和樂的家居生活很滿足也很感念，但是沒法抵擋的是心裡卻靜靜地聽著過去的聲音，過去的畫面不斷地抽換著，他的當下都是為了能繼續和過去聯繫起來。臨死前在旅社裡，他試圖留些什麼給妻子許香與愛女華華，收信人寫的是「抱月，小華華」；抱月是他對愛妻的暱稱，這名字的由來是小時候他喜歡過家裡一個下人的女兒，人稱「抱月兒」，這個倔強的女孩說什麼就是不願意跟他一起玩耍，因而常遭到母親的責罰，他到現在心裡還是放不下「何以小抱月兒竟厭恨自己一至於斯」(2001j: 206)。娶了柔順的許香，就是因為她長得像極了抱月兒，但就算如此，並沒有抹去對「故鄉的抱月兒」的思念，想來還是讓他深感孤寂。

如果小胡是跨不過以往的羈絆，那麼老儲則是因為喪子的經驗提出了另一層的解釋：雖然失去一切的依託，他並沒有因而「凌虐自己」，自恨自怨，而小胡會這樣，是因為「他的路走絕了，尚且並不甘心」，「像黑夜裡放的煙花，怎麼熱鬧，終歸是一團漆黑。所以，路走絕了，就得認；而倘若還不認，還死心眼，就得跟他一樣」(2001j: 190)，認了「或許還有路走，也或許原就沒有路了」(2001j: 192)。相對於小胡，老儲似乎看得開些，把過去的風風光光、偉大事蹟都當是過眼雲煙，人生起起伏伏的高潮點已過，該在平靜中好好走最後一段路，就算是沒路也當成路來走。但是小胡不肯認命，死路是唯一的捷徑，到地下去與過去重逢。

面對著土生土長的杜警官的詢問，老儲以植樹理論來陳述他與小胡這些外省人的心境，他說：「你在這裡長大，安安穩穩，沒兵沒災

的。你的親戚朋友都在這裡或者那裡……。你就是這樣當然地過日子，好像一棵樹長著，它當然就長著」，小胡也跟老儲說他希望能這樣，「樹從發芽的時候便長在泥土裡，往下扎根，往上抽芽。它就當然而地長著了。有誰會比一棵樹快樂呢？」問題是，小胡說：「我們就像被剪除的樹枝，躺在地上。或者由於體內的水份未乾，或者因為露水的緣故，也許還會若無其事地怒張著枝葉罷。然而北風一吹，太陽一照，終於都要枯萎的」(2001j: 191)。老儲、小胡這樣的人，已經不是原生風土中成長的樹木，樹根樹幹都還在那兒，來這兒的只是從樹分離出來的樹枝，沒法繼續吸取土壤中的養分，正在凋零當中。離開家鄉，從孕育的土壤中拔起，家被拆了就跟樹幹沒了一樣，四處飄零的枝葉，很快就會發黃凋謝。無論是老儲的自省，還是作家的觀察，相對於本省人，第一代的外省人確實有著淒涼的失根感，喪失了生存下去的養分。

小胡在鎮上的小旅社顯然睡得好覺，第三天起得很晚，也許是準備與情人見面，或是想要走得體面些，特別去理了髮。晚上八點，林碧珍開完了會找來到旅店來，小胡還沒回來，只能在房裡等，回來後，他不知道為什麼一直跟她談起從來不願多說的愛妻，又談起抱月，引發了她無法抑制的嫉妒，帶著淚水罵他是個懦弱的騙子。夜裡，他試圖跟過去那樣耍她，也許是處於逆境，沒能成事，她半夜三點叫車走了，沒想到卻是最後一面。

林碧珍，綽號birdie，比小胡年輕了十歲，出身本省富豪家庭，母親早逝，父親嘴上說沒法忘了愛妻，卻在她高二時從日本帶回來一個新媽媽和兩個小孩。她沒法接受，搬去外面一個人住，大學畢業，在外商化學公司當化驗員。為了報復罷，離開家後就開始放縱自己，有了不同的關係，直到遇上住在斜對面的Jason（她給胡心保起的名）。隔著天井，他住四樓，她住三樓，常常偷偷觀望著正在刮鬍子的、「第一個使我滿足的男人」(2001j: 201)。在birdie的陳述中，Jason是個「航

海人」(2001j: 199)，來來去去，兩人之間很自由，不過問彼此的事，一直循環著分分合合沒有壓力的關係。他總是離開，久了又會回頭，「回來，看來是那麼疲倦。但他卻總是那麼熱情」，這或是birdie為什麼有意識地「恁他耍著我」，也從沒斬斷關係。

Jason總是鬧著要分手，因為這自是「一種欺罔的關係」(2001j: 200)。因為他的熱情洋溢讓她那麼地滿足，birdie曾經跟Jason表白過，「我的父母生了我，而你卻活了我。然後他歡喜地笑起來」，他說：「現在我為了使你活著而活著。這是個挺好的理由」(2001j: 202)。這個被過去所羈絆不快樂的男人，在birdie身上找到了自己存在的意義，大概沒想到自己居然有能力讓一個人活了起來，也就暫時找到了活下去的寄託。但是，小胡終究認為這是個欺騙的關係，意思不是這段婚外情，是別的。那天晚上，在旅社裡，birdie沒法理解他為什麼老是跟她說許香，就是在想要走前能說清楚為什麼這是自己沒法過關的欺罔。其中，抱月是他一直到現在過不去的牽掛，在許香身上或找回了些許抱月的影子，其實影子裡又帶回了一直「嘩嘩地流著」的「過去的人和事物」(2001j: 189)；即便是許香娘家的柿子園，勾起他想到的也還是「故鄉的蘋果園」(2001j: 206)。面對著這個與自己學歷上沒法匹配的妻子，小胡其實有著強烈的歉疚，身體在家，心在過去，慾望在birdie那兒；然而許香卻沒有分毫抱怨，鉅細靡遺地打理著他與兩個女兒的生活起居，任勞任怨「那樣執迷地生活著」。小胡猜想許香早就發現了他的婚外情，但是「伊仍舊快樂地、強韌地生活著，令人恐懼起來」。顯然許香從來沒有撕破臉跟小胡哭鬧著罵他對不起這個家，像是「永恆的大地」一樣無怨無悔，「蔑視一切輕視、冷淡、欺騙而孜孜不懈地生活！」(2001j: 207)，這反倒讓小胡更加內疚。作家對許香著墨不多，1960年代還沒有踏入職場的本省女性，脫離了自己娘家，又沒有大家庭持家的壓力與難纏的婆媳關係，估計大都會很認命地跟著這個經濟條件不錯的外省男人，雖然他心不在焉，外面有些關係，就當是逢場

作戲也就算了，換成個本省老公，狀況也可能更糟。

可以這麼說，胡心保與許香的婚姻關係就會是他與抱月的關係。如果他能夠真地越海回家找到抱月，她可能還是大戶人家裡下人的女兒。當初抱月也許早就機伶地看破了這個關係的虛妄性，才會一直閃躲著這個有錢人家的小主人。執著的小主人不肯忘懷啊，「他因為面貌的酷似而娶了現在的妻子」許香(2001j: 205)。或許是報應吧，在舊時代就算了，活在二十世紀六〇年代，得到了貌似抱月的許香，又沒法忍受自己身上的欺罔。birdie這個富豪家庭裡大小姐的出現，重新激活了他的生命力，也相對地激活了birdie，相互的加乘作用減緩了他的內疚與欺罔感。對birdie而言，這個外省男人顯然不是典型的大男人，會在關係中只顧自己，確實帶給了她前所未有的滿足，也就更珍惜與這個「航海人」聚少離多的關係。在這個意義下，林碧珍與胡心保的關係，是〈貓牠們的祖母〉中的娟子老師與張毅少尉的再版，兩個外省男人都沒法在關係中甩開歷史的羈絆。

這位辦完第一件差事的杜警官，在結案報告裡把胡心保的死定位為一宗簡單的厭世自殺案件，追究原因是國難當前，世風低落，慾望橫流，提請有關機關重新恢復我國固有的四維八德，以正視聽。

〈第一件差事〉是再次以死亡作為方法，在生命的臨界點上逼出人們說不清的內心痛楚。而值得探究的是，當事人胡心保本身沒有發言，是透過三個關係人的回憶與辦案人員的結案報告呈現出來龍去脈，作家與杜警官的視角既重疊又分離，互為分身又各自為政，差別在於警官剛剛出道，因年輕人生歷練不深，許多訪談的關鍵內容沒法體會，作家只能期待更有歷練的讀者能把握警官放過的重要線索。

拼貼文本所提供的蛛絲馬跡，胡心保路走不下去的原因是多元決定的，其中一條主要的線索是他被過去在大陸發生的點點滴滴事物緊緊地綁住，最終，生命的燈越來越黯淡，最後一片黑暗，而橋對面的過去雖是燈火通明，但又過不去。胡心保心中之燈滅了，走不下去！

作家對胡心保這樣的「流亡學生」之所以來台的原因寫得不多，大時代變動中的人們，特別是還在長成的年輕人，沒法對局勢做出清楚的思考。有條件的人家帶著家財把男孩送出來不過是在留條後路，大概沒有人能判斷從此永別。如果要追究胡心保最終的死因，還是得回到歷史分斷的大背景：回不去的家鄉，回不去的過去，眼前漆黑，未來迷離，心中虛妄……是在這些歷史條件下，胡心保走了一條不歸路。

分析基本上做完了，但是離解開謎題還差一步。其實，作家透過胡心保早在旅店老闆帶他選房間時，看著那座水泥橋就說過：「橋的兩頭都有燈，他說。我說這頭的燈早壞了，不亮。那頭的，一到入夜，就照得通亮通亮」(2001j: 173)。作家或許是藉著小胡與劉老闆的對話偷渡了當時的心情：橋這邊的台灣六〇年代正值威權統治，被搞壞了，沒希望的；彼岸大陸的1967年正是文革初期，革命正在沸沸揚揚地滾動著，而自己與幾隻同路人又沒參與，心中鬱卒，如果活在海外，如新加坡、馬來西亞，或許他們會是回大陸參加革命行列的那群，分斷阻絕了一切，只能望洋心嘆！胡心保的離開是要同志們死了心。

「別出去了……跟我回鄉下去……」

出獄後陳映真創作的中期(1975-1990)裡，外省人繼續扮演著重要的角色。1970與80年代是台灣經濟發展的高峰期，不僅工廠、跨國公司等空間進入了小說世界，生活逐漸富裕起來所帶來精神上的困境也成為描寫的對象。除了〈萬商帝君〉裡的陳家齊該是1940年代中期在大陸出生、台灣長成外，此時所謂台灣出生的外省二代已經開始進入小說舞台的中央。〈夜行貨車〉裡的劉小玲該是第一個，出生在1950年代初期；〈雲〉裡的文秀英，大約出生在1950年代末或60年代初，父親是退伍的老士官長，母親是再婚的本省農民；〈趙南棟〉的哥哥趙爾平1944年在福建出生，弟弟南棟1950年出生於台北監獄。本文僅處理筆

者尚未觸及的〈夜行貨車〉與〈雲〉兩篇小說。

〈夜行貨車〉(1978)的劉小玲身上有著〈唐倩的喜劇〉(1967)中女主角的影子：關係多元，最後也差點去了美國。出生在一個算是從落魄中興起的富裕之家，她的父親當年在日本念軍校，是三十年代活躍於華北一代的政客，見過世面，有權力的時候意氣風發地殺過不少人，來了台灣，不問世事，鍛鍊拳腳，舞文弄墨，處於完全退休狀態。母親寶蓮比父親小了三十歲，是第四任太太，先生不管事，她生下了小玲後，就發揮交際應酬的長才，經營著不同的生意，一家大小，包括前妻的孩子們，都是靠她養活的。相較於這個衰老破敗的男性大家長，三十出頭艷麗的劉媽媽開創了一番事業，難免在外招蜂引蝶，謠傳很多，站在老爸這邊的小玲從此把老媽當成反抗的對象。高二那年，劉爸爸一個人孤寂地病死在醫院裡。父親走了，她失去了精神的靠山，心靈越發寂寞，就從這時起，老是夢到那片白色的、一望無際的沙漠，從夢裡驚醒，孤單地落淚。與媽媽的冷戰持續上演，為了刻意讓她傷心，小玲大學一畢業就嫁給了大她十歲在船務公司上班的光棍，此人不僅不能人事，隨伴而來的還有著奇特的癖好，大小姐當然忍無可忍。離了婚還年輕的她，進了外商公司馬拉穆電子做秘書工作，「過著從一個男人流浪到另一個男人的寂寞的生活」(2001k: 160)。是在這樣破碎的家庭與婚姻經驗中，這個承繼了母親豐美嫵媚的她，此刻有了英文名字Linda，在公司與她的老闆林榮平(J. P.)與同事詹奕宏(James)相遇。

出身南部鄉下農家的J. P.，在美籍總經理派系的信任與提拔下扶搖直上，坐上財務經理的位置，公司替他吧車從裕隆換成福特跑天下，他帶著太太跟兩個女兒住進了高級社區的新洋房。維持了兩年秘密戀情，J. P.很清楚自己不可能也不願意拋妻棄女跟Linda在一起，只是在婚外找尋家庭沒法提供的情感寄託，偶而以出差之名，在北投溫泉區的「小熱海」相聚。才二十七、八歲的Linda當然沒法就這樣認命，怨

婦似的哭鬧經常上演，但也沒法改變僵局，兩人的默契是她只要找到對象，隨時分開。只是紙包不住火，流言還是在職場裡傳來傳去。

就在爭吵不斷的時候，眼睛裡閃過了部門的同事James，這個一頭亂髮、肩膀寬厚、節傲不遜的年輕人，觸動了她的激情，於是以「少婦的蠱媚，輕易地誘惑了他」(2001k: 144)。沒想到的是，自己竟然真心墜入情網，愛上了這個男人味十足但不快樂的情人。

從今天的標準來看，大約出身於1950年左右的詹奕宏，是戰後出生的第一代、具有說不清楚的鄉土意識的本省青年。他的父親受完日本的中學教育，二二八的時候牽連在內，差點丟了命，正好碰上國民黨來台初期的金融危機，祖父留下的一切都破產了，老爸託了關係勉強找到個小學老師的工作，才在清苦中養活了剛剛出生的他及弟妹。政權換了，家道中落，這個老爸從此變得是怨天尤人，「抱怨政治，抱怨天氣，抱怨『外省人』……」(2001k: 158)，詹奕宏從小就是在怨氣、酸水的環境中長大，能快樂嗎？

更糟的是，生為長子，父親把家裡所有的希望都壓在他身上。在Linda那兒，喝多了酒，他才吐出滿肚子的苦水；老爸跟他說，「孩子，你看，我們犧牲自己，讓你往前走。你看，你一定要出人頭地……我們犧牲了沒關係，孩子，走哇！往那個地方走，那個我們這一輩子想到卻無法抵達的地方」(2001k: 158-159)。家裡沒條件，還是硬熬，一步一步，念了大學，還要念研究所，最後進了美國公司，光宗耀祖了，替詹家扳回一成，老爸終於把心底的痛說了出來：「我一生是失敗者……望你努力，出人頭地」(2001k: 158)。那一代男人只有靠著兒子揚眉吐氣，才能釋懷於自己的落敗，但要跟兒子承認自己是失敗者，那得是多大的傷痛。然而，對這個承擔上代人期待的大兒子，「家庭的貧窮、父親的失意，簡直就是繩索、就是鞭子」。他做到了父母親想要的，但是又憤怒於「從來沒有人問過我，我自己想要什麼，想幹什麼……」；沒法對老爸說出口的是，「為什麼要以你的失敗

奴役我，為什麼！」(2001k: 159)。這裡，作家看到了典型第三世界的社會關係，父親的愛與期許是上進的動力，也是壓迫，是上一代人的自私，也是為了家族的存活，父債子還。

這個累積了一生壓抑與悲憤的本省青年，碰上了愛他、讓著他的外省女人，就變成了他洩憤的對象。為了排解心中的妒恨，口出穢言，乃至動粗；嫉妒他的上司J. P.跟Linda有一腿，懷疑她肚子裡有了孩子是要栽到他頭上，為了她過去的男人們暴怒不止。那天終於爆發了，他藉酒裝瘋，歇斯底里地對她狂吼：「你的褲帶，就不能束緊一點」(2001k: 165)，傷啊，「他的話，像一束利刃，猛然地剝進她的胸膛。她因羞怒而漲紅了臉，眼淚如傾倒一般流瀉下來」，被自己深愛的男人這樣狠毒地羞辱，絕對是痛心至極。複雜的是為了保護這份很珍惜的關係，從沒跟他表白與J. P.的一段，現在被滿懷嫉妒的James以攻擊性的方式主動掀出來，悔恨、羞辱與憤怒於是攪在一起。他還沒放手，開始第一次的肢體暴力，狠狠地打了她一巴掌，她以「母性最原始的勇敢」(2001k: 166)，持著鋒利的水果刀保護著腹中的胎兒，氣憤地告訴他，「我劉小玲，決不會賴上你，要你娶我。我說過：孩子，我自己生，自己養大。我們母子會走得遠遠的」。雖然主體性已經清楚地出現，她有足夠的能耐走自己的路，但這晚他們還是和解了：小劉持刀的手割傷了自己，失聲地哭喊著要他別走，不知道何時掉下的淚水，暫時挽回了兩人脆弱的關係。

但是有了一次就有第二次。離不開，愛啊，怎麼辦呢，詹奕宏每次喝了酒動粗不是沒有後悔，但氣頭上來就失去控制自己的能力。在那個女性主義低度開發的時期，劉小玲一次又一次地隱忍著。狀況持續惡化，他們「彼此交換著最刻毒、最骯髒的詈罵」(2001k: 172)，直到那次他再度失控，跟瘋狗一樣地對她進行肢體攻擊；這次用椅墊保護著肚子，「她沒有哭，沒有罵，甚至沒有呻吟」，她選擇逃開。從醫院回來後，「眼光裡沒有恨、沒有怨，也無疑問地沒有了愛」，劉小玲心

意已定，放棄已經準備好要去公證結婚時用的景泰藍戒指、項飾，拿出了下個月移民美國核准的文件，丟下了一句傷害這臭男人的話：「我有孩子，你卻什麼也沒有……」(2001k: 173)。他當然吞不下去，憤然離去，在夜間的馬路上，心中狂怒的叫喊著。此刻，「在一個平交道邊被一列轟隆而過的、長長的貨車停下腳步時，他才察覺到從什麼時候起就霏霏地下著細雨了」(2001k: 173-174)。就是這次，夜行貨車第一次擦身而過，在平交道的交叉口上，逼他停下來看清楚自己的生命方向。

藉著上級單位視察業務的機會，台灣分公司總經理摩根索宴請太平洋地區稽查長達曼斯先生，同時替Linda即將赴美餞行。作為主客，劉小玲當然盛裝赴宴，準備跟這位曾經性侵過她的美國老闆摩根索、舊情人林榮平、詹奕宏與同事們道別。James因為是酒後亂性的懊悔，這晚滴酒不沾，喝的是果汁，佯裝沒事。J. P.看到兩個外國上司圍著Linda，引發了心中的妒恨，當初摩根索欺負了自己的情人還得裝沒事，心裡策劃著如何藉著公司本土化的政策，取而代之。狀況外的J. P.，出自內疚拿著威士忌的酒杯勸James去美國念個博士，好跟Linda一起，由公司負責張羅經費。James當然回拒了這個曖昧的提議，腦子裡浮現的是那晚激烈爭吵分手後的場景：「在平交道上攔住他的那列貨車。黑色而強大的、長長的貨車，轟隆轟隆地打從他跟前開過去，往南邊的他的故鄉：只有兩條小街，一出了小街便銜接一片不大不小的平原的故鄉開過去」(2001k: 178)。跨國公司酒會的場合，想的是開往南邊故鄉的夜行貨車，進了外資公司，滿足了老爸炫耀的虛榮，這到底是為了什麼，不如歸去的念頭開始燃起。

酒精下肚起了作用，紅了醉臉的摩根索拉高聲調開始闊高談論，湊向馬上要移民美國的Linda說，實在很奇怪，「我們美國商人認為臺北比紐約好千萬倍，而你們XX的中國人卻認為美國是XX的天堂」(2001k: 181)。達斯曼在旁邊以大笑附和著，是呀，跟殖民時期一

樣，離開自己國家的男人到了殖民地都開始享受著家中不容的放肆，吃喝嫖賭沒人擋著你，台北當然比紐約好，拿著第一世界的薪水過的是第三世界消費水準的日子。摩根索喝高放開了，開始不知覺中口無遮攔，話中用了髒字，經過大風大浪的Linda沒有動氣，反倒是「輕蔑著摩根索先生的失態」(2001k: 182)，笑說，「我並不以為美國是個天堂……」(2001k: 181)。她去那兒只是要離開感情的困境，投靠世上唯一可以信賴的姨媽。慢慢養大寄人籬下憋悶的詹奕宏耐不住了，發著抖用英文要這兩個老美「當心你們的舌頭」(2001k: 182)。但是聲音太小，只有身邊的J. P.聽到，用很驚訝的眼光看著他，「詹奕宏為自己怯弱的聲音深深刺傷，並且激怒了」，恨自己連反抗都不敢張揚，於是激動地提高了聲調：「我以辭職表示我的抗議……可是，摩根索先生，你欠下我一個鄭重的道歉……」；在一旁看到James起身反抗的J. P.想要攔阻事情擴大，沒想到他繼續上綱：「像一個來自偉大的民主共和國的公民那樣地道歉」(2001k: 183)。詹奕宏還有些分寸，沒濫罵，只是要老闆回復大國民的身分，對自己的失言負責。此刻的摩根索一頭霧水，不知道怎麼回事，James不等J. P.攔阻，用台語跟他說，「你，我不知道。我，可是再也不要龜龜瑣瑣地過日子！」，掉頭而去。在面對外國老闆的時候，James和J. P.分享著共同的憋氣，得按捺著心中小小的民族自尊心，現在藉著摩根索一次爆發。

被詹奕宏的反抗震攝到的劉小玲，跟著跑出了飯店，追上了她顯然還深愛著的男人。挽著他堅實的臂膀，眼角偷看著他，「方才忿怒、悲哀、羞恥和苦痛所絞扭的臉已經不見了；他看來疲倦，卻顯得舒坦、祥和的這樣的他的臉，即使是她，也不曾見過」(2001k: 184)。一旦決心離開，長期積累的怨氣與苦悶頓時散去，雖然倦容滿面，出現的卻是從來沒有過的自在與平靜。詹從口袋裡掏出那隻景泰藍的戒指，替她戴上，對著開始流著眼淚的劉說，「別出去了……跟我回鄉下去」，她拼命點著頭怕自己激動地哭出聲來。此刻，變得溫存的他，腦

子裡再次「想起那一列通過平交道的貨車。黑色的、強大的、長長的夜行貨車。轟隆轟隆地開向南方的他的故鄉的貨車」(2001k: 185)。這是第三次「夜行貨車」的出現，他似乎已經走上還願的路上。從第一次被貨車在平交道攔住，開始思索自己的生命的走向，到第二次準備鼓足勇氣離開這個美國人統治的跨國企業，一直到這次的出走，決心脫離這個「黑色的、強大的、長長的」貨車所象徵的資本主義所駕馭的世界，南部鄉下的故土幾乎是唯一可以想像的出路，是帶著愛人一同歸去的地方。

但是，作家乍似勇敢、美好的結尾其實是一個無解的故事。家，也在破敗當中，接下來的〈雲〉帶我們回去了，但工業資本早已降臨鄉下，污染悄然登場，南部農村已經不是理想的精神家園。帶著外省婆娘，家裡接不接受是一回事，離開了老爸心儀的外商公司，作為大哥的勵志成功的榜樣能就這樣丟了嗎？詹奕宏雖然心向南方，但是條件夠他義不反顧回鄉下去嗎？回了鄉下，他又能做什麼？故事繼續寫下去，一種可能的畫面是：摩根索酒醒了，弄清楚狀況後覺得不好意思，就派J. P.打電話要James回來上班，公司會繼續重用他的才華，連Linda一起請她別離職了，一起回來繼續替公司服務。至於詹奕宏是否真是變了一個人，會不會重蹈覆轍，如果拳腳戲持續上演，劉小玲生下了孩子之後，又該如何？「夜行貨車」的黑色、強大、與轟隆轟隆沈重的聲音，壓迫著「南方的故鄉」，未來不見得是光亮的。

至少在停格的小說世界裡，那天夜裡，外省第二代的劉小玲選擇繼續跟詹奕宏在一起。相對唐倩去了美國，她留下來了，或許開始跟台灣鄉下發生了關係，參與了變動中的鄉土社會。這樣的外省女性的故事目前看到的不多，但是確實存在。劉小玲如果在1970年代末去了南部，早幾年胡台麗就來到鄉下，她的《媳婦入門》(1982)留下了極為重要的文學人類學書寫。下鄉的外省人值得我們繼續追究，也許還有比〈雲〉中的老士官來得更早的。

「看看將來能不能寫出我們這種人的心情。她說的。」

〈夜行貨車〉是「華盛頓大樓」系列的第一篇，這個系列記錄了台灣社會工業化過程中的城鄉移民，特別是「鄉下」作為離鄉背井的人們想像的依歸，支撐了跨國資本得以在第三世界落地的精神基礎。〈雲〉(1980)是系列的第三篇，也不例外，只是把場景從跨國公司在都會裡的辦公大樓搬到市郊的工廠，作為經濟發展主力的工人階層開始進入了戰後台灣的畫面。比較重要的是〈雲〉是最早一批描寫建立自主工會運動失敗的小說。在國共鬥爭歷史的前提下，工人與工會是國民黨政權絕對管制的禁地，跨國公司會是相對開放的空間嗎？

根據作家的自述，1975年出獄後，他參與了《夏潮》的編務，工作過程中他曾經採訪了一個「被壓殺的工會運動始末」(陳映真 2004a: 64)。1979年10月3日他第二次被捕，36小時後在各方友人的奔走、營救下被釋放，回到給情治人員搜索搞得凌亂不堪的家中，在書房的角落看到這本採訪筆記，心情激動的他體認到，「生活在隨時可能被逮捕的日月中，寫作竟是唯一的抵抗和自衛」。是在這個脈絡下，〈雲〉次年8月在《台灣文藝》出版。

嚴格來算，〈雲〉是陳映真第一個中篇小說，它的組織結構很清楚，八個小節的構成是以兩個視角相互交叉，一個是負責推動籌組工會的經理張維傑的角度，一個是參與工會運動的女工文秀英的日記，兩個視野構成了勞資雙方在動態過程中觀看世界的位置。

張維傑是作家創作中經常出現的小學老師的原型。老家在山裡的礦區，父親畢業於日據時代的農校，戰後在鄉下的農政機構裡做小公務員，經歷有點像詹奕宏的老爸。張維傑大約出生於1950年，師專畢業後在偏遠的大武鄉教小學，充滿了出道的熱情，自願放下放牛班想要教給後段生一些基本的求生技能，自己花錢替窮苦的學生買練習本，淌著淚要他們不要自暴自棄。後來念完師大，回到礦區教國中，

繼續把自己奉獻給邊遠地區的學生，那個時期的自己，「曾經為了別人的苦樂、別人的輕重而生活」(陳映真 2001: 36)，在作家的小說世界裡，肩負著理想中小學老師的擔當。就在此時，父親病倒了，萌生了憂患意識，要阿傑在他死前買棟房住住，否則一輩子白混了。沒法再工作的老爸，拿了工作三十多年的退休金，東湊西湊，急急忙忙地買了間「販仔厝」，要他繼續償清貸款。孝心使然，他考進收入好很多的麥迪遜台灣分公司，離開了學校與他疼惜過的學生們。新調來的總經理艾森斯坦看上了他的英文能力與年輕的幹勁，為了擴大自己的羽翼，拔擢他為行政經理，要他負責推動工會改造的工作，才能掃除生產率低下的因素，但最終的目的在於「反攻大陸」：藉著台灣分公司的成功，才能回到美國總公司，對全球的麥迪遜進行管理革命。到了那時候，張經理就會跟他先前在韓、土、菲、泰各地撒下的火種一樣，會是他「復興美國理想於全球的骨幹！」(2001: 47)。年輕的阿傑就是在美國帝國大夢的感召下，開始認真地推動新工會的成立。

在裝配線上的女工文秀英，則是逐步被捲入這場由上往下推進的運動中。原來只是投稿給公司的《麥臺月報》，受到張經理的鼓勵，認為她很有潛力能成為工人文學家，結果為身邊的資深女工何大姊等人所感動，積極投入籌組新工會的運動。小文出身南部農家，父親是1950年代從空軍退役的老士官長，娶了先生過世、帶著婆婆與兩個幼兒的小文的母親，辛苦地靠著耕種幾分地來養家活口；就像是〈貓牠們的祖母〉裡的娟子老師跟張毅少尉那樣，這場婚姻也算是門當戶對，天涯淪落人能走在一起是分斷帶來的緣份。由於在大陸老家時就練了一身務農的本事，現在找到退伍後第二春的志業，重新拾起他擅長的活兒。賺錢養家是重要，更要緊的是，「種地，就像回家一樣」(2001: 53)，於是文伯伯全心投入，灌溉著這幾分田，也灌溉著整個家，想要建立起一個「勤勉、相依、相愛的家」(2001: 13)。正因為想要有個溫暖的家，小文的老爸對母親跟前夫生的兒子投入了更大的愛心，呵護

著這兩個因為母親再嫁而心懷感傷的孩子。就是在這樣一個父母雙方都在努力重建家園、珍惜再次擁有的氛圍中長大，小文因家庭的薰陶，身上有著一股純樸、真誠、盡責、敏感、踏實與高度自省的氣質。

文伯伯與媽媽的努力大致是成功的，就算事情很難完美。大了八歲的二哥，從小跟小文特別親，父母親農忙，是二哥帶著她。二哥自幼多愁善感，發展出一種悶悶不樂的個性，國中畢業後就不想念了，在老爸的催促下才勉強進了高農；高三唸不下去，離家出走，在外面混。當完兵回家，開始想要振作起來重新生活時，卻車禍喪生了，死時二十三歲，一家人陷入愁雲慘霧，幾年下來都對他「刻骨的懷思、銘心的悼惜」(2001: 33)，美滿家庭的夢還是沒法圓。為了讓家裡能過得好些，小文高中畢業後就去工廠做工，先是在新竹的一家紡織廠，然後才轉到薪水稍好的外商公司麥迪遜儀器的中壢場。

這個操著很濃的南部口音的「外省第二代」女工，看來從小到大在鄉下長大，從來就沒有融入的問題，到北部工作跟其他同事一樣，主要面臨的是想家的孤寂感。1970年代後半，就算是外資工廠，宿舍的物質條件還是很差，白天工作已經很累了，晚上在通鋪上睡覺很擠，不好意思翻身，怕干擾到別人，沒法睡，就想家。家，進入她腦中畫面的是坐在木頭凳子上抽菸的老爸，是邊笑邊罵邊落淚、對著走進庭子豬仔說話的老媽，永遠質樸、努力勞動的大哥，還有她很敬重的、只有小畢業卻有著「從生活和勤勞而來的智慧」的大嫂，卷髮的姪兒小棒棒，與那隻興高采烈的小黑狗。家，還包括她自己那張曾經跟小時候的朋友林秀麗分享的寬大的木榻，被月光照得發亮；那口會打出有甜味冰水的古井；院子後面的大片竹林在風中磨蹭裡發聲；溝邊竹蔭步道往下走，就會碰上兩邊蔗田裡飄動的葉子；還有晚上乘涼時空中劃過的流星。每次想到這些畫面，就得問自己幹嘛離鄉背井，正是這些景象支撐著她繼續留在孤寂的北部。當然，還有老爸的舊識，從小看著他長大的陳伯伯，這位「情意很重」的安徽籍老士官長(2001: 54)，

當初媳婦才過門一年他就走了，來台灣還戀著家就沒再娶，把小文當自己女兒一樣，會帶著大包小包的瓜子、蜜餞、牛肉乾來工廠看她。

「家」跟工廠的距離很遠，但是神遊時又變得很近。跨國資本的運轉不會把家算上，但是小文日記中的思鄉情讓我們不能不搭起資本與家鄉的情感關係。

預料之外的是，涉世不深的小文，在這場運動中不斷地成長，其中一個帶著她前進的，是從基層自發出現的女工領袖何春燕。本來總經理來工廠宣布要組成真正代表工人的工會後，張經理在廠裡開始動員聯繫的是敏子、素菊，後來她們在宿舍裡找大家討論，最後問到沒說話的何大姊的意見。由於歷練多，大家都聽她的，其實她充滿著懷疑；過去十七、八年在不同的工廠做過，也有參與過工會吃虧上當的經驗，之前也在美國公司做過，哪有那麼好的事，總經理居然主動提議建立工人自主的工會，不知道公司的葫蘆裡到底賣著什麼藥？這位何大姊是個苦命的單親媽媽，先生車禍死了，兒子還在上小學，但頗有大姊大的風範，對年輕的女工們都很照顧，頭腦清楚，有果絕的判斷能力，受到夥伴們的愛戴。按照過去積累的經驗，她不會贊成冒然投入，這次是在過程中觀察到張經理身上所透漏出來的誠意，搭配新上任的總經理年輕有衝勁，想要創造條件來提高生產力，或許這是個改善女工工作條件的機會，才慢慢地開始積極參與，並把有文字能力的小文也網羅進工作團隊。成長中的小文這回不再矜持，欣然同意，她從何大姊那兒學到：「工會，是使公司變得大家相處得更合理、更溫暖的工作」(2001: 69)，更何況，何大姊這些人無私的態度讓人非常尊敬，她一定要積極參與。

跟台灣解嚴前各地的情形一樣，這個工會也是掌握在管理階層手裡，以廠長與辦公室主任為中心，以親資方的蕭振坤與李貴等人為代表工人的檯面人物，背後真正的領導人是宋老闆，宋弼，在台北華盛頓大樓指揮全局。宋老闆出生在1910年左右，是上海人，因為在北京

長大會唱京戲，北京人稱票戲的為老闆。年輕時家裡開洋行，1930年代在上海結識了那時年輕、後來升到麥迪遜公司董事長位置的派特內，兩人合夥搞船運，關係深厚。四九年天地玄黃，派特內透過關係把宋弼安插在英國貨輪的台北辦事處。六〇年代末，麥迪遜打算來臺投資，派當時任職遠東部的老派來找老宋出面，以合作投資的名義成立了子公司。所以，老宋是麥迪遜台灣分公司的元老，十幾年來，總經理換來換去，他地位穩固，打下了深厚的人脈，建立起自己從上到下的派系，採購、營業、海關等部門，還有工廠、工會，都安插了他的人馬。對不買帳的人下手，加上往上直達天聽的老派特內，他的位置在總經理之下，到了新舊兩股勢力對陣時，宋老闆無疑是實力最為堅強的。設想，形成麥迪遜這樣權力結構的跨國公司，在第三世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能進入當地，總是需要在地的人脈來支撐才能運作，老宋正是代表性人物。

知道艾森斯坦派張經理打前鋒，老宋努力過想要收編小張。在他中式裝潢的辦公室，滿牆的字畫，檀香木雕花的家具，他誠懇地跟張維傑說，「臺灣很安定，很繁榮……這種安全，要珍惜，這個道理，我們這樣的人，最懂呀」(2001: 83)。老宋的意思是說他不喜歡政治，也不是替政府的成就在辯護，確實如此，就是靠工人、農民的群眾運動，共產黨滅了他大陸的家業，來了台灣安定了二十年，經濟在發展，得珍惜啊。跟美國人打了一輩子交道，老宋體會到：「美國人很天真……做美國人的朋友難，聽他們的話，吃虧的是自己，與他無干」(2001: 84)。是啊，美國是個年輕的國家，美國人沒有中國人的城府，都很天真，想得不够深。現在艾森斯坦要搞工會，到時候拍拍屁股調去別的地方，留下一堆爛攤子讓我們收，別輕易聽他的。小張回說是總經理交代，他得聽啊，老宋說遇到為難的事，大家都是同事，一起商量商量嘛。最後，收編不成，老宋開始放出半威脅的訊息，配搭著那個時代流行的手法：監聽電話。

艾森斯坦也不是省油的燈，過去在亞洲各地累積了豐厚的鬥爭經驗，深知在地有其既成的勢力都會努力防衛著自身的利益。以往能成功的方法，就是在管理階層裡找到一個有能力的人，透過他來發酵，逐步鬆動既有的權力結構，這是他主動從基層直接拔擢張維傑的主因。光靠管理階層是不夠的，他看得很精準：怎麼工會的領導人都是經理階層，佔了生產部門五分之四的女工，居然沒有選出一個工會幹部？這樣的鬧雞工會好控制，但結果是「怨恨、不忠、生產率低下」（2001：47），很明顯女工是他重整權力結構的群眾基礎，有了這樣的分析，組織新工會很自然地成為對張維傑下達的第一條重要指令。

這麼年輕就讓他當上經理，小張當然心存感激，又折服於艾森斯坦的大作《跨國性的自由》中所展現征服世界的氣魄，讓他在這小島上開了眼界，很自然就成了艾總經理的粉絲，心甘情願地為他賣命。他的信念很清楚，到了關鍵時刻，拜託女工們，「為了艾森斯坦先生，請大家一定要努力，把新工會組織起來」（2001：95）；這就是張維傑秉持著的思想，最終，不是為了工人而是為了總經理而戰。出身台灣戰後固若金湯的師範體系的小張，不太可能接觸過左翼政治經濟學，社會上又沒有自主工人運動，他大概對於勞資的對立關係都沒有概念，是在報答艾森斯坦的知遇之恩。相對來看，何大姊的位置不同，又有滿多的工會經驗，所以有不同的看法：工會不能靠一兩個積極份子，「工會要成功，要靠工人自覺，有覺醒，要靠工人相互間的團結」（2001：72），公司有誠意幫忙，工會就會替公司著想，是相互的共生體。

兩軍對峙時，有組織實力的一方總是佔上風。老工會的幹部開始積極運作了，所有工人忽然都得到工作獎金，說是工會替大家爭取的結果，藉此削弱新工會成立的正當性。7月16日下午第一次直接的對立出現了，在沒有預先通告的情況下，鈴聲大作，所有工人被要求到餐廳集合。廠裡的管理階層一字排開，蕭振坤恭請長官訓話，廠長很開明地說最近有人批評工會是好事，有批評才有進步，但是在法治國

家得依法行事，意思是現有工會依法產生，不可隨便再搞新工會，該在既有的基礎上來改進。接著，蕭振坤提出了下半年的三個工作方向，說廠方都初步同意了：（1）酌量調薪，（2）成立互助基金幫助急需同仁，（3）成立員工福利社。這三點大家聽了都很高興，正要恭請副廠長講話時，女工劉苑跳出來嗆聲，指出工會開會工人是主體，管理人員依法不是工人，最好多聽工人說話，知趣的金副廠長陪著笑臉表示同意。

此刻，何大姊起身了，把矛盾點得很清楚。她說所謂代表工人的蕭振坤、李貴、張清海，平常站在資方那邊，擺出高人一等的姿態，根本沒有代表工人的利益，今天提出三個福利方案，也是被籌組新工會所逼出來的。這大概是廠裡工人第一次講了大家心裡的話，所以掌聲激烈。何大姊繼續把矛盾尖銳化，她說組新工會壓力很大，但工會不能做表面工作，等有人出來競爭了才拋出好處，「工會要說老實話，做老實事……不說老實話、不做老實事，讓人收買，在工廠裡耀武揚威的，是工人嗎？哪裡是工人，是工仔蟲！」（2001：99）。這等於是開了第一槍，一旦把話說破，對手被打成工賊，戰火就點燃了，群眾的振奮是可想而知的。但她並沒有停在攻擊敵手上，為了要爭取支持，也提出了三個工會該優先做的事：（1）爭取女工平等工資，（2）爭取女工退休金，（3）公司不得任意裁員，逼女工辭職來調節市場狀況。這三點馬上受到佔了五分之四的女工熱烈的支持，小文就激動得直流眼淚，趙公子也亢奮得滿臉發紅。這一戰，何大姊成了全廠的英雄人物，但她心裡該有數，敵手的反擊會更為強烈的，兩邊的海報文宣戰起此比落的打起來了。

決戰點在7月25日，艾森斯坦下達了指令，投票決定是否改組工會。老宋掌控的老工會派火力全開，動用了所有從上到下的關係，威脅利誘，連小文的大哥都被動員從鄉下來廠裡要她不要管閑事，弄到工作不保。投票當天一大早，宋系找人騙何大姊說她母親病危，要她

立刻回台中清水；不只如此，還從外面找來了黑道打手，包圍在四周，伺機而動。張經理被蒙在鼓裡，董事長麥伯里被老宋動員起來，直接發了電報給艾森斯坦要他收手，這位作戰的主帥已經決定撤退，居然連現場都沒出現，出賣了自己的急先鋒與被他挑起的女工們。就是在不知道大局已定的情況下，兩邊開始廝殺了！

小文最後的一天日記停在7月24日，而張維傑對7月25日記憶猶新，是靠著他的記憶，讀者才看到事發的經過。他一大早八點四十五到工廠，發現庫房前貼的「投票處」紅紙條被撕掉一半，路已經被阻絕，只有參與籌備新工會的女工束手無策地呆站在那兒。老工會的人馬排成一道人牆，擋著不讓人去投票，告知從宿舍出來的女工們投票已經延期，要她們去工廠上班。聽到小文哭喊著對手破壞投票，張經理還想努力扳回，要大家等總經理來主持公道。九點十分，何大姊跳下計程車出現了，衝向辦公室，卻被李貴擋住，何破口大罵，說中計了，被騙回家看病危的母親，結果根本沒這回事。對手企圖切斷何大姊跟她的團隊，排成人牆把她跟草坪那邊的女工分開，此刻戲劇性的場面出現了：人緣不好的女工魷魚奮勇地衝了出來，咬著張清海的手臂，試圖替何大姊打開一個缺口，結果被甩在地上，「突然間，魷魚迅速地扯開自己的衣服。只一瞬間，她在七月的陽光中，裸露著上身。她的一對豐實的乳房，隨著她不易抑遏的怒氣，悲憤的起伏著」(2001: 111)，魷魚含淚向張清海叫陣，脫了上衣讓敵手不敢貼近，好殺開一條通路。沒人想到會出現這樣的局面，魷魚的大膽作為把對手和自己人都嚇到了，「人、陽光和空氣，在那一瞬間，彷彿都凝凍起來了。沒有人說話，沒有人動彈」(2001: 112)，魷魚藉機抱住何大姊，推開張清海，邁向草坪，回神過來的李貴想要抓住何大姊，被支持女工的阿欽與阿祥憤怒地阻止了。集結在草坪上的女工積極份子們相擁而泣，混亂中向庫房的投票處集中。

艾森斯坦沒來，倒是老宋坐著他的別克轎車出場了。他的出現「仿

佛使一個鼓脹的氣球，刺破了一個細小的穿孔，全廠的氣氛，開始緩慢地、卻也持續地消降」(2001: 113)。原來緊繃的場面結束了，總經理沒來，來的是宋老闆，勝負已分曉，投票不可能繼續，廠長迎著笑臉要大家上工吧。何大姊還是沒放棄，大聲呼喊，要人牆另一邊的工人們衝過來，但大勢已去，人們不甘心地移向工廠準備上班。此刻，小文站上了一個票櫃，抑制著心中激動的情緒，對著正在散去的人潮喊話：「大哥、大姊們。你們就這樣撤下我們嗎……？」，「你們不來，我們不能怪。但至少，請表示你們的內心，對我們的支持……」，「用什麼方法都可以，請，表示，你們，沒有撤下我們……」(2001: 114)。小文舉起自己黃色的工作帽，一邊擦淚一邊揮舞著，工人們停住了移動的腳步，

忽然間，幾百隻藍色、白色、黃色，分別標誌著不同勞動部門的帽子，紛紛地、靜靜地舉起，在廠房、在宿舍二樓、在裝配部頂樓，在電腦部的騎樓上紛紛地舉起，並且，在不知不覺間，輕輕地搖動著，彷彿一陣急雨之後，在荒蕪不育的沙漠上，突然怒開了起來的瑰麗的花朵，在風中搖曳。(2001: 114)

這是一個極度感人的畫面。原來羞怯、青澀的小文，在運動中成長，最後扮演著運動積極份子的角色，在失敗中扳回了一分工人的尊嚴，幾百隻不同顏色帽子的舉起，意味著心中的支持。客觀的環境還不成熟讓工人們以投票的形式進行對抗，但這個舉止不僅在當下重要，讓積極份子們的努力沒有完全失敗，而是在替未來做準備，或許在下一波運動中，他們會繼續前進，選出自主工會。放大些來看，在體制嚴密的控管下，戰後的台灣工運一直到1980年，真是荒蕪一片，在沙漠中要重新灌溉，談何容易，人們能夠舉帽支持，那真是像沙漠中忽然出現的花朵，隨風搖動，令人驚羨不已。這該是作家寫作的心情。

運動失敗了，何大姊與小文決定離職前要去跟總經理把話說清楚，希望他能保住其他女工的飯碗。張維傑請了一天假，試圖平息心中的憋悶，第三天(7月27日)一早接了她們兩人開往台北總公司。車上，張經理表白，這件事自己受了傷害，連帶著讓她們也都受傷，心裡很不安，但希望小文不要放棄，繼續在文學上努力，能夠寫出女工真正的心聲。看著窗外的藍天，白雲游動著，正在思索中的小文默默地說：

實在說，我方才一直在看著那些白雲。看著他們那麼快樂、那麼和平、那麼友愛地，一起在天上慢慢地漂流、互相輕輕地挽著、抱著。想著如果他們俯視著地上的我們，多麼難為情……

像這樣的天、這樣的雲，和這樣的心，如何去寫呢？……不，我寫不來的。(2001: 117)

在鬥爭失敗中成長的小文，此刻的心情是低落的，但小範圍內姊妹們挽著、抱著的團結與合作的悸動卻又是那麼真實的，帶給她人生更大的意義，體會到人活著不必只是為了自己，同時也是為了創造更合理的生存環境。受到分化與打壓，工人最後沒法團結起來，當然很沮喪、失望，相對於鑲在藍天上的白雲平和、優美的飄流著，地上的我們是感傷的，沒有機會也不可能寫出這樣的美景。這不意味著她就這樣放棄了，最後小文在何大姊之後選擇辭職，離開了麥迪遜，為了不想帶走心中留下的厭惡，她把日記留給趙公子請她轉交張經理，讓他知道「我會努力，看看將來能不能寫出我們這種人的心情」(2001: 14)，她沒有放棄，對未來還存有希望。

張維傑帶著何大姊與小文去見艾森斯坦，他不見，說語言不通，把事推給老宋。老宋圓滑，要她們不要辭職，想收買何大姊，說下一屆工會給她安排一個候補幹事，同時保證其他人都會沒事，照常上

班。退出辦公室時，何大姊很有禮貌地懇求，「那些姊妹們，要請您多疼惜」(2001: 8)，雖然相信老宋一定會秋後算帳，心裡還是抱著一絲希望。結果還是在她預料之中，敏子、趙公子、素菊、魷魚，十幾個，一個個不是被氣走、就是被逼走，老宋當初的承諾不過是外交辭令，笑臉裡藏著刀光。

送走了何、文，張維傑去見了艾總，想知道投票那天他為什麼違背承諾最後沒去？艾這才告訴他老麥拍了電報來，命令他停止投票，此時保持緘默、全然幻滅的張維傑才知道被賣了。更糟的是艾森斯坦還說董事長的話是有道理的，「企業的安全和利益，重於人權上的考慮」(2001: 119)，這大概就是艾自圓其說何以選擇撤退的原因吧。張維傑還能說什麼，只能笑笑，起身離開；但他吞不下去，回到自己的辦公室，這句話怎麼樣都跟《跨國性的自由》的作者艾森斯坦的理論兜不起來，反倒是讓他發暈，「突然間，一陣翻胃，他衝到洗手間，哇、哇地吐了一地」(2001: 120)。在「噁心至極」的情況下，他上了辭呈，艾總會如何反應，沒有進入小說的鏡頭，猜想他只能嘆口氣，表示委屈，好容易在台灣培養起來的人馬，看來將來在他的帝國版圖擴張中派不上用場了。

〈夜行貨車〉的詹弈宏最後想帶著劉小玲回南部家鄉，但張維傑是真的回去了山裡沒落中礦區的老家。跟詹伯伯一樣，意料之中，張伯伯很不高興，放著好好的外商公司不做，失業要怎麼面對左鄰右舍、親戚朋友原來的欽羨？心中本來就很鬱悶，老爸冷眼施加的壓力，讓他沒法待下去，有家歸不得，只好又逃回台北。走前老媽還私底下塞給他三萬元，七湊八湊開起了一人公司，混飯吃。那正是台灣經濟起飛的年代，許多的小公司就是憑藉著進出口貿易有些生存空間，張維傑在跨國企業留下傷痛的經驗，選擇自己幹，公司勉強活下來了，忙不過來的業務才逼他聘請了能幹的單親媽媽朱麗娟做秘書。兩年下來，在瞎忙的日子中，他慢慢地淡忘了麥迪遜慘痛的記憶。南部出差

的巴士上，巧遇趙公子，後來收到寄來的小文的三本日記。夜裡，讀完日記，「卻無端端地聽見他那原已彷彿枯萎的心的孱弱的呻吟」（2001：121），日記中女工真誠的連帶，讓他看到自己過去兩年不過是「讓這個迅速轉動的逐利的世界捶打、撕裂、剝削，而懶於認真追求自己的生活……」（2001：122），就連身邊一起工作的朱麗娟都被他當成只是「打雜的機器」（2001：123），從來沒認真對待過，該是重新找回自己有點人味那面的時候了。夜裡三點了，離開辦公室前，他留了公文請朱麗娟早上代發，同時留下話：「倘若你今晚有空，我想請你到臺北吃飯。非常希望你答應。如果不放心把丫丫放在家裡，也把她帶來」，簡單的兩句話濃縮的是他對朱麗娟的謝意、歉意與情意，他試圖改變自己，跟身邊的人發生真實的人的關係。對自己的頓時體認「溫暖地微笑起來」，終於做了件還像人做的事，走在辦公室外，「天上是稀稀落落的星星，在夏夜中溫柔地眨著眼睛」，肯定著他回到基本做人的底線。

故事是這樣結束的。年輕時的張老師充滿熱情地要幫放牛班小孩找到些尊嚴，現在幫不了人忙，至少得關心身邊的人，讓自己活得像個人。轉了一圈，到了三十出頭的張維傑還是被小文的日記、被那群跟他一起走過一段的女工們所喚醒。這或許是〈雲〉的基調：「向人民學習」，像「向工農大眾學習」。此刻，1980年，對岸的文化大革命已落幕，但餘波盪漾，作家是不是還捲在這個思想的浪潮中，很難判斷，但在本節一開始時提到，作家1970年二進宮，回來後心有餘悸，體會到只能用寫作的行動進行抵抗；特別是「向工農學習」與七〇年代末期作家所參與的鄉土文學論戰之間，是有內在的聯繫，才導致79年1月的逮捕事件。而在這一連串相互掛勾的序列事件的脈絡來看，〈雲〉確實是作家宣言式的政治實踐，是在憤怒與無奈的心情中激盪出的作品，幾乎是他唯一直接書寫工人運動或是前工人運動的小說，蘊含著召喚階級主體意識的意味。小文的那句話——「我會努力，看看將來能

不能寫出我們這種人的心情」（2001：14）——至少是作家主觀的期待，表現出他的感念與反抗。三十年後，台灣的工人文學、繪畫、攝影、音樂等創作慢慢地湧現出來，確實開始直接表達著「我們這種人的心情」；無論小文後來是否繼續創作，小文們的出現多少正面回應了〈雲〉的呼喚。歷史拉長來看，〈雲〉是催生自主工運的文本，揭示的是1970年代的客觀狀況，必須放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來理解，工會運動份子回過頭如何看待〈雲〉，該是研究的課題。

回到「外省」女工小文的家。陳映真筆下的「家」幾乎都是殘破不堪的，沒有條件成為人們的依託，小文的家幾乎是唯一的例外。雖然作家沒有用油彩去美化這個從破敗中站起來的家，老士官長碰上了這個帶著婆婆、拖了兩個油瓶的媽媽，文爸爸在田地耕作中一邊想家、一邊落地生根，小文的誕生不僅意味著本省外省結合的下一代出現在歷史舞台，也意味著文爸爸對「家」的認知大概很難再只能是對岸老家。這個經驗與〈歸鄉〉中的楊斌是倒反的，卻也是一致的。我們可以猜想十年後，1990年，文爸爸帶著台灣的妻子、兒女，和對小文倍加照顧的陳伯伯組成了返鄉團，一起經過香港啟德機場，踏上四十年前沒法回去的故里。我們也可以猜想，如果2000年文爸爸還活著的話，得經過政權更替中的焦躁與不安，或是文秀英被迫面對原先不太是問題的身分認同的焦慮，她是外省人還是本省人？我們繼續往下看。

「畢竟，臺灣和大陸兩頭，都是我的老家，對不？」

1970年代末起，台灣的政治社會已經進入躁動期，一般將79年的美麗島事件視為地標。黨外政治運動的初期是以爭取(美式)「自由民主」為訴求，統獨問題、省籍議題一直是暗流。隨著民進黨在1986年組黨，87年解嚴，91年的台獨黨綱，以及日後的選舉，統獨、省籍的交差在政治上被動員起來，成為主導政黨競爭的主軸。中間不是沒有

曲折，如李登輝是以第一個台籍人士接掌國民黨而後當選總統，走向所謂獨台路線，與民進黨既聯合又鬥爭。但是整體而言，從八〇年代中期起，台灣的政黨政治所牽動的主導性動向是以省籍／統獨為主軸的動員，一般以2000年民進黨奪取政權為地標。從美麗島到陳水扁上台的兩個地標之間相距二十年，台灣內部撕裂與分化，兩岸之間的緊張關係不斷升高。此期間，幾乎在同時，共產黨1979年發佈《告台灣同胞書》，鄧小平的一國兩制、和平統一政策逐步形成。1987年國民黨政權在多元決定的壓力下，蔣經國宣布解嚴，緊接著開放探親，得到對岸立即的回應，解除了1949年以來歷時三十八年兩岸隔絕的狀態，可以說是分斷體制鬆動的一大步。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陳映真近期的三篇創作，〈歸鄉〉(1999)，〈夜霧〉(2000)，〈忠孝公園〉(2001)，以他四十年來所累積的對省籍問題的理解，試圖以文學來介入台灣社會被挑動的政治矛盾，一方面尋求島內族群的和解，一方面搭起兩岸和解的橋樑。〈歸鄉〉是1999年5月完成，9月發表於《聯合報》，估計它的構思早幾年就在醞釀，不是難以下筆就是不好收尾，是最後被收在《陳映真小說集6(1995-2001)》的一篇；或許1995年就開始動筆了，故事場景的時間點也是坐落在93、94年左右。

〈歸鄉〉的主角「外省」老人楊斌，其實是宜蘭人林世坤，1946年底被國民黨軍隊送去大陸打內戰，後來回不來，換了楊斌的名字，在大陸待了四十六、七年，一直到兩岸開放探親才回台灣。這個鄉音已改、鬢毛衰的「台籍外省人」或是「外省台灣人」的出場，確實鬆動了過去對於「外省人」、「本省人」或是「台灣人」固定的理解。這個鬆動，意味著分斷體制只有在絕對的隔絕狀態中，才能樹立起決然的劃分，兩岸的流動愈發快速，「外省人」最終會在未來被認定是49年之後出現的歷史名詞；伴隨著「新移民」，是否會有其他的語彙會出現，如「外地人」與「本地人」，目前看不準。

故事的發生坐落在台南附近的卓鎮，三介宮後的公園裡早覺會的成員發現不知從哪兒來了老頭，太極拳打得出奇的好，大夥兒於是一起跟這位自稱是楊斌的老人搭訕，希望能教大家打拳。早覺會的成員男男女女，有本省人也有外省人，大家基本上和睦相處，也許是政論節目看多了，藍綠矛盾撲天蓋地地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當中，難免碰上些的口角，大都是靠女性以嬉笑的方式化解開來；張清的太太素嬌與郝先生的老婆郝媽媽，經常機伶地扮演著破解尷尬的角色。

練完身，大家在已經七十高齡還在賣水煎包的老朱的攤子那兒早餐，繼續遊說老楊給大家上課。老朱聽不出老楊的口音，說北方不像，說南方也說不清是哪兒，就問他府上哪裡，老楊遲疑了半天說，「臺灣，宜蘭……」(2001n: 10)，把大家嚇了一跳，兜不起來。要他講兩句台語，他說都忘了，要他說幾句日語，也忘了，大家確定他真是在開玩笑，這玩笑卻拉近了原本陌生的距離。的確，特別是兩個老人，發現老朱當初是六十二軍，老楊是七十師，有得好談了，相約去老楊家好好聊聊。幾天後，「臺灣的外省人」老朱跟「外省的台灣人」老楊見面了，互相細說了國軍兵敗如山倒的那段，讓讀者補了現代史不能講的一課，也拼貼出了老楊的身世。

本名林世坤，1927年出生於宜蘭，家裡三代都是佃農，生活困苦。光復後，父親年紀大，母親雙眼失明，兄弟三人，他是老大，老三腿癱，從小怕他被欺負就去接他上下學，兄弟兩人感情深厚。老三沒法幹活，靠著老二跟他兩人賣命地幫人做田，家人還是吃不飽。1946年際，阿坤看到駐紮在宜蘭的七十軍招新兵的廣告：「先發三千元安家費，免費學國語，兩三年後退伍，安排地方機關工作」(2001n: 35)，條件還不錯，跟老爸、兄弟商量，如果不去當志願兵，老二被強行徵召，家裡沒人就麻煩了，所以自己就高高興興地去了。

老楊後來的分析是，當初去當兵其實不特殊，很多人從軍的原因不外乎家裡窮、社會經濟凋敝找不到工作，最重要的是很多年輕人都

認識到，「日本天年盡了，祖國天年來了。將來退了伍，分配工作，就會說國語、會寫國語……在貧窮、殘破的戰後，那是個多麼幸福的夢想」(2001n: 24)。是啊，回到祖國懷抱，總得學會普通話，當兵提供了這個學習機會。有些部隊開出保證，不會送去大陸，就在臺灣當兵；陶醉在一片即將脫困的幸福當中，很多人是一半自願一半被騙去的。入伍的第二天，連長就跟他說從此改名楊斌，頂上連裡名冊上原來就有的這個名字，省得重新申報罷，反正這真楊斌已經失蹤了。這樣，阿坤不但從此改姓楊，也從此失去自由，軍營變成了看守所。十二月部隊行軍到高雄，被兩邊上了槍膛的外省兵逼上船，要回頭來不及了，有人哭天、有人喊娘。船開了，有人跳海逃生，被機關槍斃掉。

1946年底，老楊所屬的七十師到了徐州，47年6月拉去山東金鄉，此時聽說共軍過了黃河，很多人慌了，開始逃亡。一個逃兵被抓回來，十幾個臺灣兵都跪地哭著替這同鄉求情，懇求長官別殺他，連長氣急敗壞，殺雞儆猴，一槍斃了他，所有人都恨地牙癢癢的，軍心渙散。7月在六營集跟共軍遭遇，部隊心戰喊話，說共匪狠毒，被抓時鼻子耳朵會給割了酒，要大家奮戰，結果一個當過日本自願兵的臺灣高山族，當場切腹自殺。國軍就是這樣潰不成軍，還沒打就輸了。在塔城被打散的七十師整編後，12月被困在徐州西南的陳官莊，天氣太冷，又斷了糧草，老楊倒在雪地上失去了知覺，是被劉班長一巴掌拉回人世的；老劉後來為了守著上面發下來的馬肉，給搶奪食物的自己人槍殺了。接著，48年拉去東北，49年春天全軍覆沒，投降了共軍，老楊成了俘虜，被送到石家莊集中，成了趙營長的傳令兵。

在服侍趙營長時，老楊從他那兒學了後來受用無窮的太極拳。國軍投降了，在等待處分的期間，除了讀些共軍發的書刊外，趙營長就在大宅院的老槐樹下打拳，看老楊沒事幹就鼓勵他，「你離家千萬里，流落在他鄉……要下決心，活著回家，見爹見娘」(2001n: 7)，要他跟著後面慢慢學，把身體鍛鍊好，哪天才有機會回台灣拜見父母。不

管是不是為了有一天能回家，老楊跟營長學了好一陣子拳，養成了長期鍛鍊的習慣，到老了還能健步如飛。

從老楊跟老朱的對話中，我們了解了臺灣兵如何去了大陸。兵敗後加入了解放軍，之後發生的事是老楊跟三弟的兒子、他的姪兒林啟賢閒聊時說的。50年後，有些臺灣兵被送去朝鮮打韓戰，有些轉業，大都陸續結了婚，老楊是在這時候成的家。接下來，大陸經過了「運動」的二十年，55年「肅反」，58年「反右」，66年開始十年文革，這時的臺灣兵因為做過國軍，「打反動內戰」，其中又有些做過「帝國主義的走狗」的日本兵，都成了「歷史反革命」(2001n: 64)。老楊也不例外，戴上「蔣幫特務」的帽子，被送到河南五台廟勞改，過了將近三十年抬不起頭的日子。

回想起來，老楊認為最慘的是，在這一連串的運動中，人們為了自保，跟所有人都畫清界線，「人為了信念，或者為了自保，人跟人就那麼對著幹，是由不得自己。但也該有個限度。好好一個家散了。受不住苦，或者為了保護家小，不能不自殺的也有……」(2001n: 64)。在政治運動的籠罩下，很多事情都走過頭了，超出了該有的極限，包括最親近的愛人關係都是如此；就連當初「在戰火中為了生存始終互相扶持的臺灣同鄉，也互相寫告發信，也把人不當人地整」(2001n: 64)，人間關係全然破產。然而就算是這樣艱難的狀況下，還是有人會用些方法來幫助你，「塞給你半塊饅頭」(2001n: 65)，嘴上兇狠地要你改造，實際上是想法保護你。

比旁人運氣好，老楊的愛人從來都挺著他，「有批鬥我的會，她一定參加，坐在我只須一抬頭就看得見的地方。她不是來聽批鬥。她是要讓我知道，我最艱苦的時候，她總是在場」(2001n: 65)。是在他愛人的扶持下，才大風大浪地活了下來。經過了這些災難，夫妻倆得到的共識是：「以後再有什麼大風大火，也絕對不能不做人」。這個素樸「做人」的基本信念讓他們保有了生存起碼的底線，後來不管到哪兒都

帶著走。

到了八十年代初，鄧小平「改革開放」政策來了，老楊得到平反，補貼了損失，還坐過政協委員，重新撥雲見日了。更要緊的是，改革開放的政策走向，再次燃起了他返鄉的念頭，父母、兄弟、左鄰右舍，還有「在無數個夢寐裡出現的遼闊的、在風中打著稻浪的蘭陽平原和山山水水」(2001n: 49)，就像〈纛纛〉中的魯排長思念著小姊姊指向故鄉的青山與一望無際的高粱田，家鄉的風景在眼中徘徊。在大陸渡過三、四十年，雖然已經安家落戶，有了太太、兒子、媳婦、孫子，依然沒法忘卻過去的家園，「幾十年來，這些切切的思念和對於此生還鄉的絕望，互相糾纏，讓楊斌在明知的絕望中又不禁款款思親，在鑽心的鄉思中面對此生終須客死他鄉的冷牆……這樣地度過了多少年年月月」(2001n: 49)。是，兩岸的對決使得返鄉成為夢想，但是又沒法清除思鄉的念頭，兩者不斷對抗著。落葉歸根不成只能客死他鄉的悲情，是這個思土重遷的民族最不願意承擔的淒涼，總是存著些希望罷。

他鄉遇故知是人間樂事，在台辦的牽引下碰上來自老家鄰近的礁溪的黃姓商人，老楊激動地兩手發抖、老淚縱橫，黃先生發了誓一定幫他找到宜蘭的家人。事情當然沒那麼順暢，半年後老楊三弟的兒子啟賢才回了信，字裡行間看得出來有「難言之隱，欲言又止」(2001n: 54)。等林啟賢花了很大力氣辦妥手續，把大伯接回來後，才慢慢發現其中的隱情。1950年代，國府推行「耕者有其田」政策，三代佃農的林家終於分到了兩甲多地，十幾年後，林家老父過世前把地一分為三給三兄弟，其中一份留給大哥，特別囑咐，就算阿坤死了也要留給他的妻兒。後來碰上台灣的工業化，農業生產低彌，城市快速擴張，地價翻了好幾翻。林家老二逮到機會賣了地，成了暴發戶，新車、賭博、包養女人、花天酒地，變了個人；他的大兒子林忠炒地皮、開酒家，為了更發達還選了縣議員。當初幾封信寫回家，沒人回，其實就是擔心他回來分地產。林忠還指著照片上的穿著說，「一看，就是個共產

黨」(2001n: 60)，背著家人去法院公證林世坤早就死在大陸，打算趕快把他名下的地賣給地產商。老三雖然已經過世，但之前老跟兒子說他跟大哥親，加上二伯父一家人忘本的作為激怒了他，啟賢決心把大伯接回來，討個公道。

把伯侄關係拉得很近，是老楊剛回台後上墳掃墓的那次：

楊斌在蓋成小屋似的墓室前跪下來，開始全身顫抖，而後放聲哭了。林啟賢從來沒見過這樣哀切的男子的哭號，彷彿要訴盡一生的苦楚、漂泊和離散。他和大伯之間，原本隔著年輩；隔著他無從攀登和探視的歷史；隔著遼闊、陌生的地理。但那一天，楊斌那至大的哀傷和悲愴，深深地滲透到他最裡面的心坎，使他淚流滿面。就打從這回起，林啟賢忽而從生命中感覺到大伯是親人，是骨肉，他甚至感覺到上天竟活生生地又給了他一個新的父親。

楊斌慟哭了一會，站起來接過林啟賢為他點上的香，再三揖拜。墳地的秋天，顯得蕭索。這裡那裡簇生的管花，像一叢叢白色的旗子，向著風孤單又愁苦地搖曳。(2001n: 61)

少小離家四十多年，老楊所走過的一切不可能一時之間在墳前向父母說完，但是終於圓了掃墓的夢，背後所積累的思念、內疚、辛酸拌在一起，此刻無法抑制地噴發出來，他激動地抖動著，最後失控潰堤了。陪著大伯、二伯來上墳的啟賢，原來心裡還暗藏著一些說不清楚的疑慮，他沒法翻越過兩岸之間的山頭來看清楚大伯走過的歷史，更何況大陸是他從來沒有去過的地方。儘管如此，大伯哭號裡純樸的真誠卻真實地感動了他；儘管四十六、七年的時空分隔，但在祖父母墳前的真情流露，跨越了原來的鴻溝，特別是這個跟自己老爸像極了的大伯的出現，讓他在父親走後重新找到精神上的寄託。在悸動中回過神來的老楊，才又完成了焚香祭拜的儀式，願父母親天上有知，感

謝他們保佑他平安地回來了，祈求上蒼給予父母安息。墳地的場景速寫著老楊的心情，秋天空曠的山裡總是有些淒涼，久沒清理的墳旁濃密的干草頭上白色的細穗隨風飄盪，承載著孤寂與哀愁的感傷，至少老楊歸鄉了。

作家這段寫得很經典：血緣的親情，靠著真情的抒發，人在做天在看，感動了姪兒啟賢，重新連結了分斷的家族；縱使底下暗潮洶湧，人們薰心地爭奪著物質的利益。最讓老楊過不去的是與林忠通電，這個晚輩居然藉酒裝瘋，罵他是共產黨，「是冒牌來搶財產的外省豬」(2001n: 66)，說完還掛他這個大伯的電話。他當場氣得快瘋了，決定要走法定程序找回自己真實的身分，討回財產，好出口氣。親情讓他最後放棄了無端捲入的惡質的爭鬥，孫兒小虎來電想爺爺，想得放聲大哭，要爺爺回家，讓他明白到，「四十多年來，我想的是家，是人」(2001n: 62)，是親情，不是財產，「要爭、要搶，傷心啊，我不要了」(2001n: 62)；電話那頭的老伴也跟他說，「我們不要了。別為了財產就不做人」。就在這個「做人」的基本底線上，老楊認為大陸的老伴與台灣的姪兒是一致的；啟賢說：「人不能像二房那樣。不可以那樣……」(2001n: 63)。「人不能那樣」，是啟賢與老伴所分享的共通點，不論是政治壓力或是經濟利益，都有人會在堅持這個至少的信念。老楊跟姪兒說：「別人硬要那樣，硬不做人的時候，我們還得堅持絕不那樣，堅持要做人。這不容易」，啟賢的眼裡「閃爍著喜悅和孺慕」(2001n: 67)，終於理解了大伯的心情，感染著自己尊敬的長者做到了該有的堅持。

抱著釋懷的心，老楊準備踏上歸途，回到他開始思念的大陸老家。姪兒要他常回來看看，他表示下次要把那兒的家人都一起帶來，並開心地說：「畢竟，臺灣和大陸兩頭，都是我的老家，對不？」啟賢回答得很簡潔：「對！」。作家在具體人的層次上以「兩邊都是我的家」找到和解的方案，透過老楊特殊的經歷讓下一代的啟賢理解到這是合

理的安排。

「外省豬滾回去！」是九〇年代後期台灣族群矛盾發展到高潮時出現的政治語言，〈歸鄉〉是在回應、介入這個「已經太超過」的語境。然而，奇特的是，作家選擇了本省青年林世坤離家的故事，去嫁接外省老人楊斌離鄉背井、落地生根後返鄉的歷程，表面上是以亂世中身分認同的多重性顛覆人們對於「本省」、「外省」的刻板認識，實際上是將具體的「人」擺回大歷史中去解釋身分、族群形成的時空條件：是超乎人能夠駕馭的歷史洪流決定了個人的命運、認同，乃至於姓氏。在揭示中國人最為基本的「家族」如何在資本主義利益導向的台灣面臨崩解的同時，作家並沒有放過對社會主義祖國幾波政治運動是如何走過了頭的反思，面對歷史才能超克困境中的衝突矛盾是作家一貫的信念。〈歸鄉〉中的兩代人還能有些相互理解的好下場，然而真實的狀況卻不必然如此。〈忠孝公園〉老特務馬正濤與外省二代的祝景，心情上早已分道揚鑣：老馬不可能回大陸，決心死守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而小祝在台灣沒路了，決定要回老爸的家鄉蘇州探路。祝景的困境與林啟賢的體悟完全不同；最後，馬正濤在陳水扁2000年上台後，自殺身亡，客死他鄉，與楊斌的「臺灣和大陸都是我的家」，是兩種近乎相反的結局——反映的該是作家面對兩種政治狀況截然不同的心情，迫使他得重新思考1999年〈歸鄉〉中還存在的、以「做人」為底線的樂觀期許。

外省人的故事該如何寫下去，是楊斌帶了一家老小搭上直航的班機歡喜地回了宜蘭，還是祝景到了蘇州開始發現到想要融入的困難？外省第三代已經對省籍問題免疫了嗎？或是找到了他們自己的路？新的狀況總是伴隨著新的困惱。

從1987年兩岸恢復交流至今三十年，早期是台灣的居民至大陸探親，接下來擴大為旅遊、經商、工作、上學、定居等，中間當然有外省人也有本省人。值得一提的是第一代外省人搬回大陸家鄉定居並沒有形成風潮，楊斌的狀況提供了一些解釋：四、五十年裡既有的關係

網絡、生活習性都已形成，回去看看容易，要搬回老家不僅心理要大幅調整，生活上也得重新適應。至於第二代、第三代要回老家大概更難；上海地區集中了大量的台灣居民，意味著大都會區域將是人們移動的主要流向。作家筆下第一代外省人有家回不去的思鄉情，已然隨著分斷體制的鬆動在快速地消散中。可惜的是，作家還沒寫下後來「大陸新娘」、陸客「自由行」等等的故事，只能期待年輕的作家們繼續向下寫。

「在我心裡，我早把你們當成我的親父母了」

2004年6月，陳映真寫了一篇感人的散文〈阿公〉，訴說了一段妻子外省家庭的故事。1950年底，妻子的母親、他的岳母從福建上了小船，投奔早些來到馬祖討生活的先生。因為開照相館賺了點錢，遭人嫉，告他拍照替匪採集情報，被關了起來，經岳母的多方奔走，救回了岳父。因為岳父美術上的才藝，被收留在軍中康樂隊，後來隨部隊調防金門島。1952年之際女兒呱呱墜地，趁著部隊調動苗栗，而後駐紮宜蘭，一家三口來到台灣。到了宜蘭，無法攜眷入營，那時開小麵館的阿養叔，在普遍對外省人有所顧忌的情況下，遲疑地收留了這對無依無靠的母女。岳母勤奮的打理家務受到阿公全家人的喜愛，不僅不收房租還把她們當家人一般地對待，女娃病了，阿婆典當了首飾把她送醫治療。1950年代中，岳父爭取到退伍的機會，帶著妻女離開宜蘭去台北找工作，揮著淚水、心存感激地告別阿養叔一家人。別離後的兩家關係沒斷，往來密切。因已培養出深厚的信任，岳母說服了阿公讓自己的女兒嫁給一個外省軍醫。在她們一次回宜蘭看望時，阿養叔提出要收女娃的母親為女兒，她感動落淚，說十六歲離開福州，在台灣就是靠阿公的照顧，「在我心裡，我早把你們當成我的親父母了」（2004a：188）。阿養叔儀式隆重地請出祖宗牌位，焚香跪拜，擺下酒

席，歡天喜地地把陳映真的岳母收為義女，作家的外省妻子也就從小有了一位本省阿公。阿公過世時，岳父母一家人也都被列入訃聞的親屬當中。在靈前祭拜的作家，看著阿公的遺照，悸動地認識到，「在廣泛庶民的生活和世界中，堅實、自然而且又動情地超越『省籍芥蒂』的鴻溝的、偉大而又可敬的同胞之愛、接納和力量……」（2004a：189）。

這大概是陳映真最近一次對於省籍問題的表述。2004年處於扁政權之際，他把希望指向庶民階層真實發生的情誼，期許著人們能以生活裡的真愛跨越政治上燒起的矛盾。早在1960年〈鄉村的教師〉裡，作家透過吳錫翔看到村民們一般存在的「省籍的芥蒂」（2001b：38），可以說，四十四年間，他不斷在觀察、記錄、描寫分斷體制下的外省失鄉人。經過細讀相關的文本，可以總結出些什麼問題？

陳映真早期，在1960年代的文學創作留下了一筆重要的資產，對各型各色的外省人從大陸來台後與本省人的互動狀況，提出了他相當集中的觀察。最早的〈貓牠們的祖母〉裡，已經很敏銳地看到張毅的出現破壞了祖母與孫女之間早已形成的相依為命的關係，而張少尉給娟子老師帶來的奇妙的性生活又參雜著過去戰場的夢魘，祖母身上承載的本土民間信仰與國共內戰的歷史，於是在這個小小的家庭空間中相互激盪著。無論如何，張毅與娟子還是在破壞了既有的格局中結合了。而〈將軍族〉的小瘦丫頭與三角臉，雖然心心相惜，但物質條件更糟，命運更坎坷，他們選擇一起歡樂地走，期盼來生再聚時可以不再被貧窮所帶來的羞辱所挾持，小說中弱階級之間的連帶處於核心位置。〈一綠色之候鳥〉的季叔成與本省妻子很努力地跨越了階級差異，最後還是沒法承擔社會歧視的龐大壓力，季太太先走一步。這篇小說的重要性在於作家不僅寫到了季叔成與趙如舟這些年長一代外省人的孤寂，也開始提出了他的政治分析：國民黨這樣迷途的候鳥，水土不服，終將失去生命力。〈永恆的大地〉則進一步透視出年輕一代外省人的虛妄性：木雕刻匠對於家鄉的企求是父親強加給他的包袱，不能不

扛，對於大陸的家鄉沒能有深刻認識的機會，又沒法全然落地活在異鄉，作家覺察到他們最終的出路必然會在這片永恆的大地。相對來看，〈某一個日午〉中的房恭行可以說是走了另一條路，以死前的遺書對父親背叛年輕時期的理想進行批判，生後的彩蓮也選擇留下胎兒、自力更生，是對墮落中的國民黨政權的疏離。〈纍纍〉聚焦兵營裡的外省軍官，描寫他們當下的慾力與對於家鄉依戀的重疊，失鄉人雖然身體活在現在，卻跟年少時青澀的沃土緊密地聯繫著。〈最後一件差事〉的胡心保把這種依戀推向極致，眼前的一切都喪失了意義，他的心活在過去的抱月，活在當下的身體則如行屍走肉，只能藉由帶給外遇林碧珍的生命力來換取繼續存在的意義；如果說三角臉跟小瘦丫頭對來世還存著希望，他的輕生是徹底絕望的體現。

所以，在陳映真早期的小說世界中，外省人的精神狀況是極其幽暗的，他們的心靈跟對岸的過去鎖在一起，與本省人的結合更是困難重重，死亡與暴烈的衝突是經常出現的結果。唯一例外的是〈唐倩的喜劇〉(2001i)：唐倩離開台灣在美國找到她的出口；但是按照作家的思路來看，黃花綠葉失去了它原來的土壤，很快會凋零的，待在異國該有那兒的心酸吧。值得思索的是，作為鄉土文學的代表性作家，他看到了外省人的虛妄性，但是並沒有指指點點，下達外省人應該在此落地生根、放棄家鄉、認同台灣的指令。透過小說他對外省人的狀況同情中帶有批判，這些狀況對他而言都是民族分斷的結果，不是在台灣內部就可以解決的，他看得很清楚是歷史的大勢把人逼死，也迫使美國成為逃逸的夢境。

歷史的發展到了七〇、八〇年代，台灣進入快速經濟發展的時期，在本文處理的兩篇中期陳映真的小說，1979年的〈夜行貨車〉與1980年的〈雲〉是以跨國公司為背景，主人公劉小玲與文秀英都是所謂外省第二代，她們脫離了第一代的失落感，更為深植台灣社會，但不是沒有她們的迷惘。劉小玲長成於資源豐厚但又缺乏溫暖的外省家

庭；年輕能幹的母親是四太太，與老去的父親差了三十三歲，她青春期的反抗對著母親的權威與其不斷外遇的傳言而來，使得母女關係緊張，最後造就了失敗的婚姻，卻遺傳了母親的能耐，吸引著身邊的男人們。不意外的是在那個時代裡，兩個本省男人進入了她的生命；與唐倩不同，她沒有移民美國，選擇跟南部來的詹奕宏回到鄉下。劉小玲的人生軌跡其實深受到「分斷家庭」結構的制約：父權的落敗、母親的強勢、大家族複雜關係（諸如親戚輿論與婆媳之間壓力）的缺席，形成了強制性移民家庭的基本結構，創造了劉小玲與母親直接的對抗關係，乃至於她的任性出走。我們看不到離家後的她與原生家庭的連帶與依賴，是在落單的孤寂裡徘徊。相對來看，文秀英出身下層社會、本省外省聯姻的農民家庭，雖然缺乏物質資源，卻是溫暖、互信的。空軍退伍無依無靠的士官長與喪夫後帶著婆婆和孩子的寡母，他們彼此相互珍惜，努力地經營、灌溉著這片困難的家園。文爸爸在田裡的耕作找回了他夢中老家的農民生活，在台灣落地生根，和文媽媽與秀英的大哥共同構築了一個自力更生、充滿人味的家，孕育出文秀英這樣秀異的女兒。小文是帶著這樣和睦家庭的支撐下進入台灣七〇年代的工業化過程，投入工會運動多少是期待工廠能夠跟她溫暖的家庭一樣，大家相互幫助，讓工人們可以得到合理的對待。最後運動失敗，小文帶著傷痛的經驗離開，卻沒有喪失與人相處的基本信念，期許自己未來能夠繼續寫出工人們的心聲。如果把八〇年代的重要作品〈趙南棟〉一併納入討論，可以看到就算是成長在這個家破人亡、支離破碎的外省家庭裡，趙南棟的人格特質依然是家庭的產物，跟劉小玲與文秀英一樣，沒法脫離他們的家族史來解釋。

相對於早期小說中呈現出外省人的幽暗與虛無，七〇年代的外省第二代一方面受到父母輩心情的牽引，另一方面也在走自己的路。作家筆下劉小玲與文秀英的身上並沒有太多認同的焦慮，尤其是小文已然與鄉土社會融合，不再有〈永恆的大地〉中木雕匠的苦悶、包袱與焦

躁。這段看似外省第二代逐漸融入的年代，同時正在醞釀著「認識論」轉化的暗流，她們沒有任何的大陸經驗，分斷的隔絕狀態下，中國成為抽象的符號，造成大陸與台灣在意識中逐漸分離，¹到了八〇年代中期開始的本土化運動與以獨立為核心的政治運動，終於在第三代身上完成了最後的切割：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

正是在認識論斷裂已然形成的前提下，作家近期的小說扛起了重新縫合歷史的嘗試，再度回到前一代人的生命歷程。〈歸鄉〉的老人楊斌確實貌似台灣原來熟悉的外省人，經驗、長相、口音都跟「我們」差很多；他的前身林世坤離開台灣去大陸太早，老楊又回來得太晚，是分斷體制開始鬆動、藍綠對抗與省籍分化的高峰期出現的異數。透過串連「太早」與「太晚」的同時，把中間的空白補上，通過這個台籍外省人／大陸台灣人的生命軌跡與政治變動的交錯，作家重回分斷體制出現的原點，引領台灣的讀者進入對岸五〇年代至今的變化。在此意義下，〈忠孝公園〉可以說是〈歸鄉〉的續篇，將時間拉長到戰前的三、四十年代、空間延展至大陸東北與台籍日本兵足跡走過的東南亞。馬正濤與林標在「忠孝公園」的得以交會，要回到戰前、戰後的帝國主義史，才能得到充分的解釋。他們一生的精神困境源自於早年捲入滿州與日據的軍國主義，戰後的東西冷戰、國共內戰又阻絕了大規模集體反思的契機，到了晚年承擔著無法卸下的沈重與悲悽。作家寫出那一代人錯綜複雜的軌跡所構成糾結的心情，正是尚未解開的歷史情結，從〈歸鄉〉到〈忠孝公園〉，經過〈夜霧〉，把林世坤／楊斌、李清皓、馬正濤、林標、乃至於最年輕的祝景，擺在同一個劇場中的舞台來看。作家所有近期的小說其實是在梳理過去，同時帶著讀者向歷史提出了

1 作家在〈趙南棟〉(1987)裡寫到哥哥趙爾平跟弟弟談起父親狀況時，已經出現了變化的跡象。趙爾平說父親提到中國時，是把大陸跟台灣都包含在內的，他自己也有些訝異，因為跟他的認知有些不同，在他的經驗內，有些人們說中國的時候，指稱的是台灣，大陸是不存在的，在一邊聽著的弟弟趙南棟則並不關心。所以，認知在三代人之間起著變化，參見陳映真(2001m: 162-163)。

初步的問題，重寫整理、解釋、反思現代史因而成為超克分斷的首要知識工作。

把陳映真四十年來對於外省人的書寫當成一個異質的歷史變動過程，看到的是他對以庶民階層為中心的關切。自始至終外省人意味著「從大陸來的這些人和我們很不一樣，講話也不一樣，上榻楊米也不知道要脫鞋」(2004b: 69)；相較於他對五〇年代左翼份子書寫中極為動情的介入，且作家與對象的距離常常會消失，對於外省人，除了少數的篇章(如〈將軍族〉)，寫作的基調是站「我們」的位置，試圖同情地對經驗很不一樣的外地人群進行理解。在這樣相對「客觀」的寫作裡，呈現的歷史風貌是：第一代年輕的外省人離鄉背井，精神的困境在於過去的羈絆與融入新環境時造成的衝突矛盾，表現在知識人身上是失根帶來的虛妄性所造就的彈性、抽象與隨波逐流的機會主義傾向。他們與政權的關係是貼近的，隨著分斷體制的深化持續加強，國民黨是權力的象徵也是精神的寄託。正是出生於分斷狀況中，第二代外省人在1980年代末之前，活在四十年的阻絕裡，沒有第一代人對家鄉在情感上的連帶，台灣置換或代表了中國成為他們生活與情感上「永恆的大地」，所以在劉小玲、文秀英、趙南棟的身上，看不到「心向祖國」的影子。但是隨著八〇年代末期分斷體制的開始鬆動、兩岸經濟整合的逐漸深化、以省籍／統獨為主軸的政治民主化運動路線的升高，情勢開始劇變，在返鄉運動熱潮的帶動下，第一代外省人開始重新跟大陸家鄉聯繫，第二代也在省籍問題的壓力下調整對原有中國的想像，嘗試與大陸建立起新的關係；〈忠孝公園〉裡焦躁不安的祝景是具體的表現，他希望在陌生的、父親的老家找到自己的歸屬。整體而言，在兩岸重新縫合的過程中，外省第一、二代的族群確實扮演著積極的角色；但是香港回歸至今二十年問題叢生，過去二十年的兩岸互動經驗告訴我們，重新整合的道路是崎嶇的，它的走向不僅牽動著台灣內部的變化，也將會對大陸未來發展產生不可測的作用。

在耙梳了陳映真三個不同時期對於外省人的書寫之後，讓我們回到本文一開始提及的參照。如前所述，在東亞的範圍內，作為分斷產物的「外省人」能夠對應參照的是南韓的「失鄉人」，這兩個人群的移動都肇因於意識型態對立下的全球冷戰與民族內戰。如果把南北越的分裂、新馬分治、印巴與印孟分離等也納入想像，那麼似乎「正常」的日本戰後的狀況就顯得很特殊了，或許得歸因於戰敗的美軍接管時，沒有出現兩個對峙的政治力量形成內部分裂。也就是說，分斷問題在亞洲（乃至於第三世界）具有相當的普遍性，在冷戰鬆動、新冷戰格局正在形成的當下，我們應該更為廣泛、深入地進行多個區域之間的對照。最近十年來，相關的研究與討論開始出現，²使得不只是陳映真對外省失鄉人的長期書寫有了得以參照的、更為寬廣的空間。

歷經內戰、冷戰，這批顛沛流離、為家鄉的過去所牽引的人們，並沒因後來物質環境的改善有了更穩定的家園，就此安心、釋懷地終老餘生。六十年代年輕的胡心保過不了關，2000年的馬鎮濤逃了五十年終究閃不過良心裡藏著的判官；同樣，六〇年代中期海邊的木刻匠虛無的失落感，雖然經過八〇年代文秀英積極投入、跟她所認同的人們一起打拼，也終究沒法解開祝景胸中的不安與徬徨。我想說的是：拉長歷史的縱深來看，這些第三世界真實持續存在活生生的精神狀況，被湮滅在燈紅酒綠社會的表層之下；我們慣用既存的詞語來理解，如資本主義的異化，其實閃過了另外一條持續轉動的歷史鋼軸，看不到這根主軸的運轉，我們逃離了直面真實的契機，脫離我們自身所處的社會。陳映真的作品是通往認識第三世界精神狀況的起點，我們的研究不過處於初階段，根本還沒充分展開，例如，我個人期待有韓文閱讀能力的研究者，能夠在崔末順(2010)初步打下比較研究的基礎上，更進一步通過黃哲暎早期的與近期的著作，與陳映真進行對

2 參見如Butalia(2001)有關印巴分離後遺症的討論，與Kaul(2001)。

照，提煉出更為深層、更具延展性的問題。

「本省人」與「外省人」會消失嗎？或是瓦解「本／外省人」、「台灣／中國人」、「美國人」、「歐洲人」……

以上的分析貼近作家寫作的歷史情境。本文開始時與非洲經驗的參照，其實早在1994年南非正要在形式上結束種族隔離體制時，曼達尼當初受聘開普敦大學出任非洲第一個非洲講座，在就職演說中就提出了尖銳的問題：「移住民什麼時候會成為原住民？」他以馬克思主義的思維模式提出的回答是：只有當原住民與移住民都消失時。換句話說，如果原住民（與移住民都）是殖民者的發明，那麼只有殖民體制被徹底瓦解時，這對關係才可能解放出來；也就是，只有當原住民與移住民都能成為平等的「公民」(citizen)時，二者的身分喪失了「先來後到」的性質。

平行的參照顯示，「本省人」是「外省人」的發明，這對關係性指稱是歷史的產物，極為可能在歷史未來的進程中喪失其政治意義。雖然外省第三、四代在當下承擔著前所未有的身分焦慮，但是他們也都是台生台長的「台灣人」，相對於新一波的移工、外籍配偶、大陸新娘（移住民），他們都是台灣人（原住民）。

在方法論上看，曼達尼的馬克斯主義式的論證——只有工人與資本家消失時，資本主義才能宣告瓦解——是規範性的理論推演。作為第三世界馬克斯主義者的我們，雖然也主觀地希望那天可以到來，但是公民權可以長遠地解決今天現實的問題，如跨國移工的拘留問題嗎？歷史化地來看，「公民權」根本不是「我們」接地氣的產物，而是歐洲民族國家的基本裝置。citizen的想像來自歐洲城邦，主題是城市，不是翻譯中所謂的「公」民。公民預設的「公」、「私」截然劃分（近似於「朝廷」與「民間」的空間想像區隔），在第三世界一般的狀況是：公私

的界線不清楚，乃至於「公民社會」經常與「國家」互換。在台灣、韓國、中國大陸等地，學界與政府官員長期存在「借調」關係，這難道不是「學而優則仕」的傳統？更何況，長久以來公民社會的領導人搖身一變，脫掉草鞋換上布鞋成為掌握統治機器的政府官員，站到鎮暴部隊的後方與沒有入閣的運動份子進行對抗。簡言之，要落地就必須與過去接軌，「公民」與「民間」之間、「朝廷」與「民間」之間交叉重疊，既延續又斷裂。「政府」(state)是現代的產物，它的擴張性是前所未有的，(國民)教育是典型的實作。更為重要的是：「城市」在第三世界一直是「鄉村」的延伸，「城市」一旦落地就不再是歐洲七、八十萬人小國寡民的狀態。許多城市成為龐然大物，動則上千萬人口，當代的「農民工」進城依然與「村子」之間存在著強烈的流動關係，「城中村」是相當普遍的現象；還別說雖然「耕讀傳家」已成為過去，「解甲歸田」卻依然相當普遍。

想說的是：將「公民」(乃至於其他配套裝置如「主權」、「民族」、「國民」等)從歐洲搬來，是規範性典章制度的設計，一旦落地就開始變異，與既有的土壤之間發生了磨合、裂縫等無法緊密接軌的現實構造，久而久之形成了另外一套社會機制，不可能無縫接軌，因而無法用歐洲式理論的概念理解變動中的社會機制。

但是如果我們把曼達尼的規範性期待轉化成分析性的思維方式，或許更具生產性：前一波的settler到了下一階段的國家形成配置中成為native，到了再下一波的政權變動中，上一波的外來者又成為了native。settler vs. native，似乎較為精準地描繪／解釋了現當代歷史的一般現象。「五族共和」怎麼會跑出六十五個「少數民族」？「四大族群」(所謂外省人根本不具統合性又是如何形成一個「族群」？)又怎麼忽然變成「六大族群」？「九族文化」變成「十五族」又變成「十六族」？這些變化顯示的無非是統治機器發明的裝置，是因應現實搞出「界而治之」的手法。

陳映真的文學真實地記錄了「身分認同」在台灣戰後不同階段國家

構成中的悲情慘劇。作為陳先生的晚輩，我們反省到思維方式出了問題，進行分析時要更為冷靜、更為後設地指出「民族國家」、「國語」、「主權」、「公民」、「公／私」、「個人」、「集體」……等裝置不過是典章制度的設計，一旦開始操作，並不是統治集團所想像的那樣。我們必須誠實地指出他「認識論」、「方法論」的歷史侷限，一方面看到他對主體在戰後狀況中所經歷的苦難，另一方面更要揭示這些經驗不是歷史的必然，才可能從身分認同政治中解放出來。

是的，我們是在挑戰民族國家，是在揭示任何身分認同的膚淺理解，必須大聲疾呼，瓦解「本／外省人」、「台灣／中國人」，「韓國人」、「日本人」根本不存在，「非洲人」、「拉美人」、「阿拉伯人」、「美國人」、「歐洲人」……男男女女、資產／無產階級都不過是現代歐洲極端平板膚淺的發明，我們沒有義務要跟風，也有權利反抗強加於人的暴力性。

深知這樣的陳述會讓許多同志反感，但是政治可以妥協，只是不容輕易搓掉，在思想方式所有層次出了大問題的當下，我們選擇因忠言逆耳而承擔眾人皆醉我獨醒的孤獨，幾十年來不就一直是這樣走過來的嗎？我們不過是在堅持、延續、承襲陳映真一輩子的百年孤寂，關鍵在年輕世代的路會怎麼走……

(2011年9月23日初稿於新竹寶山，發表於世新大學9月25-26日台社學會會議；10月7日二稿，12月修訂；2012年7月14日三稿；2017年3月四稿，發表於廈門大學會議；2017年6月5日定稿於新竹、台南)

參考書目

中文書目

白永瑞、陳光興，編。2010。《白樂晴：分斷體制·民族文學》。台北：聯經出版社；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 史濟民(陳映真)。1973。〈某一個日午〉。《文季》1(8月):132-138。
- 宋玉雯。2007。《「良婦/娼婦」間的可能性:酒家小姐的記憶與身分轉換》。新竹:清華大學社會所碩士論文。
- 亞菁。1981。〈試評陳映真的「第一件差事」〉。《愛情的故事》[陳映真作品14],頁151-157,台北:人間。(原刊於《台灣文藝》74[1981年9月]:239-244)
- 胡台麗。1982。《媳婦入門》。台北:時報文化。
- 秋彬(陳映真)。1970。〈永恆的大地〉。《文學季刊》10(2月):80-87。
- 馬姆達尼,馬哈茂德(Mamdani, M.)。2016。《界而治之:原住民作為政治身分》。北京:人民出版社。(原文見:Mamdani 2012)
- 崔末順。2010。《〈悠悠「家園」與〈忠孝「公園」〉:黃哲暎和陳映真小說的歷史認知》。《台灣社會研究》78(6月):183-214。
- 曼達尼,馬穆德(Mamdani, M.)。2017。《瓦解殖民世界:非洲思想家馬穆德·曼達尼讀本》[台灣社會研究論壇28]。王智明、沈思、陳耀宗、楊雅婷譯,陳光興編。台北:行人文化實驗室。
- 「超克分斷體制」專題。2009。《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4(6月)。
- 黃哲暎。2002。《悠悠家園》,陳寧寧譯。台北:印刻。
- 。2006。《客人》,金勝一、苗春梅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 許南村(陳映真)。1981 [1975]。〈試論陳映真〉。《第一件差事》,頁17-30。台北:遠景。
- 。2001。〈後街:陳映真的創作歷程〉。《父親》[陳映真散文集1],頁51-69。台北:洪範。
- 陳光興。2009。〈白樂晴的超克分斷體制論:參照兩韓思想兩岸〉。《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4(6月號):3-47。
- 。2011。〈陳映真的第三世界:50年代左翼份子的昨日今生〉。《台灣社會研究季刊》84(9月):137-242。(2013年此文以〈陳映真的第三世界(上/下):1950年代台灣左翼份子的昨日今生〉為題,轉載於上海出版的《現代中文學刊》2:14-33及3:26-48)。
- 陳映真。1989。〈韓國民眾的對立文化〉。《人間》44(6月號):8。
- 。2001a。〈序〉。《我的弟弟康雄》[陳映真小說集1],頁1-2。台北:洪範。
- 。2001b。〈鄉村的教師〉。《我的弟弟康雄》[陳映真小說集1],頁31-46。台北:洪範。
- 。2001c。〈貓牠們的祖母〉。《我的弟弟康雄》[陳映真小說集1],頁85-94。台北:洪範。

- 。2001d。〈將軍族〉。《我的弟弟康雄》[陳映真小說集1],頁181-202。台北:洪範。
- 。2001e。〈一綠色之候鳥〉。《唐倩的喜劇》[陳映真小說集2],頁1-26。台北:洪範。
- 。2001f。〈永恆的大地〉。《上班族的一日》[陳映真小說集3],頁33-50。台北:洪範。
- 。2001g。〈某一個日午〉。《上班族的一日》[陳映真小說集3],頁51-63。台北:洪範。
- 。2001h。〈彙彙〉。《上班族的一日》[陳映真小說集3],頁65-76。台北:洪範。
- 。2001i。〈唐倩的喜劇〉。《唐倩的喜劇》[陳映真小說集2],頁65-76。台北:洪範。
- 。2001j。〈第一件差事〉。《唐倩的喜劇》[陳映真小說集2],頁159-211。台北:洪範。
- 。2001k。〈夜行貨車〉。《上班族的一日》[陳映真小說集3],頁129-185。台北:洪範。
- 。2001l。〈雲〉。《萬商帝君》[陳映真小說集4],頁1-123。台北:洪範。
- 。2001m。〈趙南棟〉。《鈴璫花》[陳映真小說集5],頁93-202。台北:洪範。
- 。2001n。〈歸鄉〉。《忠孝公園》[陳映真小說集6],頁1-67。台北:洪範。
- 。2001o。〈忠孝公園〉。《忠孝公園》[陳映真小說集6],頁125-229。台北:洪範。
- 。2004a。《父親》[陳映真散文集1]。台北:洪範。
- 。2004b。〈我的文學創作與思想〉。《上海文學》(1月):62-70。
- 趙剛。2011。《求索:陳映真的文學之路》[台灣社會研究叢刊15]。台北:聯經出版社;台灣社會研究雜誌社。
- 西文書目
- Butalia, U. 2001. *The other side of silence: Voices from the Partition of India*. Delhi: Kali for Women.
- Kaul, S. (Ed.). 2001. *The partitions of memory: The afterlife of the division of India*. Delhi: Permanent Black.
- Mamdani, M. 2012. *Define and rule: Native as political ident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